全盤西化言論三集

全盤西化言論三集

目錄

編者引言

三年來，中國智識界對于「全盤西化」的文化理論及其主張的反應與爭論，在廣州和在北方，曾經很熱鬧地表露于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的春間。這些言論和文字，我們當時已經搜集刊印于「全盤西化言論集」，和「全盤西化言論續集」之中，使關心今日中國文化的出路的人，容易得到參考的材料。

我們留心讀過這些文字及其論證的，想都能看出反對論者的態度，日有改變，近于或贊成「全盤西化」的論者，日趨日多；雖然起首叫做擁護「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後來理論上也大大的改變起來了。

所以我們在討論全盤西化問題的初期，所謂反對論者，好像還是很有理由，振振有辭的說得十分起勁；但是討論到最近的階段，不獨反對全盤西化論最力的

復古派已像「死老虎用不着再打」，就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調和論，也「受了很大的劍傷，很少人相信」：這總算已引起中國智識界對于這問題更確定，更積極，再不容猶豫的態度了。

二十四年中的重要文字，當「續集」出版時，還有許多未曾採入。現在我們把牠散見于各期刊的，搜集在這裏，出版「三集」。

麥發穎

二十五、十、三十。

西化問題之批判

張佛泉

（一）

近來國人對於西化問題頗多討論，尤以「創造」「中國本位的文化」的呼聲爲最高。這問題的確異常重要。我在這裏把自己的意見提出，不知能否供關心這問題的人的參考。

國人對於接收西方文化一事，雖始終未經過深刻的批判的研究，與大規模的具體的討論，然而對於這事却也不是沒有態度表明的。比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便是對接受西洋文化很清楚的一種看法。清末之以「忠君，尊孔；與尙公，尙武，尙實」，及民初之以「法孔孟」及「尙武崇實」爲教育宗旨，也是代表類似

的態度的。就實際運動方面看，我們也可以見到各期運動之所以不同者，便因各期對西方文化採取不同的態度，有不同的理解。曾李的洋務運動；康梁的維新運動，再進一步的國民黨的革命運動；和五四以來的新文化運動；便是好例。到近來對西化問題又有兩種態度，一是「全盤西化論」，一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或說是「創造的」文化論。所以我們可以見到國人對西方文化的態度是有的，並且時常在那裏搖擺，變動。

現在我們要問，這幾十年來在對西方文化態度的變動中，到底有沒有牠一定的趨勢呢？就大體上講，我們可以發現是有的。我在另一文裏已經輕輕論到這一點（載國聞周報十二卷九期）。依着時間的邁進，我們對西方文化的長處，實在是愈承認愈多的。我們在起始祇承認西洋文化的「器」或「用」而不承認牠的「道」或「體」，或是祇承認牠的「物質」而不承認牠的「精神」。當時所以採取這種態度的原故，也

許是由于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澈底了解，祇見到了牠的「用」，而未見到牠的「體」；也許是由于以爲他們的「體」不配我們採納，而祇有「用」足供我們借取。無管當時所以取那種態度的理由是怎樣，但祇採取了西洋文化的一半（至少現在我們認爲祇取了一半），却是無疑的。這種「二元」的論調，現在幾乎已經成了公認的錯誤。繼這種硬性的二元論之後，便是現在所流行的調和中西文化論。這一派以爲東西文化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所以我們應當去自己之所短，取他人之所長；拾他人之所短，保自己之所長，而藉此望能產生出（不，創造出）新的文化來。這種態度能否站得穩的問題，我們暫且留在下面討論。我們現在祇願指出，這一派人比起硬性的「二元」論者，已經有了許多進步。他們一方面是更勇敢了，更比較走向極端了；一方面却與西方文化取得更多的妥協，將原來的頑梗態度軟化了許多。這一派人不祇承認了西方的「用」，在他們的「體」中也發現了長處，並且以爲

這些長處可取。所以若用數目字來計算這種動向，我們可以勉强地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論祇承認了西方文化的二分之一，現在的東西文化調和論却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所以在這種動向中我們可以見到我們接受西方文化是愈來愈增加的。現在竟已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這種動向不管是由於有意識的推進，還是由於無意識的變化，不管是我們所喜歡的，還是我們所嫌惡的，但牠確是史實。

（二）

主張調和中西文化的人，有一個似乎最足動聽的理由，這便是中國欲想在這世界舞台上佔一脚色，必須有自己的特殊文化。同時他們以爲我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也不能一筆抹煞。我們既能立國幾千年必有牠的特長，這特長亦必值得我們

保存。所以若在此時不加選擇與判別，而整個盲從西人，則我們的個性將因之消失，國家也許再不能立足在大地之上。其實這種看法，完全是出于一種神經過敏的虛怕。這種過慮在歷史上是沒有基礎的。就人類歷史上幾樁大事說來，我們曾見到羅馬人接受希臘文化；北歐野蠻民族接受羅馬及希伯來文化；中國接受印度文化；日本接受中國文化，現在又接受西方文化。然而却未見到接受旁人文化的將自己的個性完全失掉。卽使沒有文化的團體羼入有文化的團體，或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階段較低的民族混入階段較高的民族中，嚴格講來，也不會完全消滅的。至少一國的「空間時間的特殊性」（用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中語）是永能保持的。關於這一點，我想胡適之先生的看法是非常之正確的。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卽使我們努力全盤接受他人的文化，而結果也要趨向於折衷的。所以我們在這裏實無所畏。但若在沒開誠接受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自己的文化消滅，那便仍是

一種變象的保守主義。

再，以爲祇有保持住中國文化特色才足以立國，才足以與各國抗衡，也是不合邏輯的誤念。我們試想，如果以我們十足的整個的舊有文化不足以與西方文化抗，保持了原來文化中的某部份反能以之退敵麼？並且文化之高低與國之强弱不一定要有正比的關係。歷史上已有過許多文化高的民族被較不開化的民族征服了的例。至若目前中國所遇的情形，國既弱，而文化似又不如人，偏妄想藉保持舊有文化來維護民族生命，很明顯的祇是一種欺己欺人之談。爲講邦國主義(Nationalism)，爲激發國民的自信心，也不一定必須主張保持原有文化。我以爲這是兩件事。一方面澈底採取旁人的文化，一方面也可以對自己有極大的自信力。日本簡直就正在這樣幹。她拚命在實質方面「模仿」西洋(所保留的大部是形式，她們尊天皇，實際便等于西人的重國家。)同時却不小看自己。易言之，講邦國主義不一

定要拉住民族性(Nationality)問題不放鬆的。(請參看拙著「邦國主義之檢討」載去年本周報第四十期及四十一期)

另外我們還常聽到有人在「讓中國應「創造」新文化，而「其創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領域中因失去特徵而沒落的中國和中國人，不僅能與別國和別國人並駕齊驅於文化的領域，並且對於世界的文化能有最珍貴的貢獻。」(見二十四年一月十日十教授宣言)我覺得這一類的話如果不完全是沒意識的，最多也祇不過是犯了夜郎的誇大狂。處在今日，步人的後塵尚望不及影子，還提到甚麼「並駕」、甚麼「齊驅」，甚麼成爲「一枝最强最勁的生力軍」？卽使這是將來可能的，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必存這種期望。我們應有努力的決心，應立定志願，然而在今日却不能先談甚麼珍貴不珍貴的貢獻。將來到底有無貢獻，須回過頭去看。正如一個人做詩，運思想，在寫時，在想時，當然要努力，然而在未寫未想之前却先以詩人思想家自期自詡

，那便成了笑話。你是否詩人，是否思想家，須待旁人看了你的產品再來論定。在今日整個中國被人騎在了脖子上面喘不出氣來的時候，却偏想對世界文化有甚麼「最珍貴的貢獻」，眞成了最無聊的compensation。我寫到這裏，使我想到魯迅的「阿Q正傳」描寫中國人的心理實再深刻沒有！

關於「創造」文化方面，還有一義應順便指出。這便是近年來最時髦的「迎頭趕上去」的一句話。這句話我簡直百思不得其解。甚麼叫「迎頭趕上去」？怎樣叫「迎頭趕上去」？何以既「迎頭」，而又「趕上去」？我不明白這一個 metaphorical speech有甚麼意義！

（三）

全盤西化論也不是絲毫沒有問題的。我個人在大體上很同情于全盤西化論，

並且非常佩服陳序經先生的勇氣，敢取一種不騎牆的態度。但是我們對於全盤西化論也可以舉出三個問題來分析。

第一，我們應問全盤西化是否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我認爲以全盤西化爲理想是不能完全達到的。前面回答恐怕自己文化消失的話，反過來又可以用在全盤西化論上。文化是自然有牠的惰性，你不主張折衷，不希望妥協，然而至終却仍要折衷，仍要妥協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以全盤西化爲理想，所得恐怕也不過是一半。所以若接受了文化「自然折衷」論，同時就須承認全盤西化不是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

第二，站在全盤西化的觀點，進而講到「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面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的話，也未免太過。如果這句話含有大部眞理，如果採取旁人的文化必須是「批發」的，而不是「零售」的，是取其一端就必須取其

整體的，是牽一髮則動全身的，那末接受文化豈不倒變成了極簡單的一件事了麼？文化既是這樣機械（或說是這樣有嚴密的組織）的，豈不是祇學了其中任何一樣，便立刻可以得到其整個文化了麼？比如依這種看法，是不是學了打撲克，其他任何西洋東西都「自動地」就學到了呢？卽我們不將這一論點逼到這等荒謬的地步，而祇就要學便須全學　義來講，我們也可以見到其中並沒有十足的理由。事實是這樣：我們模仿西人的事物，是隨便從那裏學，學那一樣，都可以的，都有人在這樣做。比如我們可以見到許多闊老一面學西人坐了汽車，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有許多人穿了很漂亮的西裝，却一個外國字母也不認得。這是事實，一個民族之接受另外的文化是零碎的。也許時間過久了，坐汽車的不再弄姨太太，穿西裝的都會念外國書；然而從上面的例我們已經可以見到，接受另外一種文化是不必需採取"All or None"的方式的。文化「雖不像一間屋子，屋頂

壞了，可以購買新瓦來補好」，然而也不能說「文化本身是分開不得」的。你如說文化「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那麼很明顯的事實却給你個反證說，文化是可以隨意選擇的，雖然所取的是否長，所去的是否短，却不無問題。所以我以爲若說文化是近乎有機體的，是有系統的，可以講得通，若說文化絕對沒有單位可分，而不能單獨採納某一部份，則未免又是忽略了具體的事實。所以若爲全盤西化找辯護的理由，祇好先證明：要西化便全盤西化才好，才能得到利益。而不能，亦許不必，即說要西化便必須全盤西化，便不能不全盤西化。祇圖證明全盤西化才好，理由便已很多。比如說、我們若是學了西人的堅甲利兵，同時也要學他們的淑世主義，至少也要學到他們的邦國主義才好，才不致向外人買了利器，祇爲大規模地屠殺自家弟兄。

第三，若以全盤西化爲目前努力的目標，也含有可能的錯誤。我們在上面一

節已經講到西化不必出以全盤方式，而是有選擇的。那末，卽是在實際上本已有選擇，並且在理論上也可以承認有選擇，我們在這時便不能再避開選擇的問題不談，聽憑渾渾噩噩的大衆作無計劃的，無意識的胡亂模仿。事實既不容許我們在一旦之間，突然在各方面總動員地採納西方文化，於是輕重緩急的問題便不能完全再忽略。所以在這時談西洋文化，總不能整個含混地主張全盤接受。我覺得我們是要先認淸指定某一方面是我們應該努力的目標的。而祇堅持樣樣都要「完整平勻」地接受，反成了擺脫一層批判工作的方法。換言之，我以爲在目前適應西洋文化，是有根本上與枝葉上的分別的。祇囫圇主張全盤文化，也許已經包括所有根本與枝葉在內，但不能指出根本方面比枝葉方面更重要，便是缺欠。我以爲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被人指爲「皮毛西化」或「籠統西化」，不是沒有原因的。至少他所新鑄的「全盤」一詞，須承認容易惹人誤會。

（四）

我們現在再對文化調和的問題一加分析，並略述我自己的主張。我以爲講文化的調和也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說法。而不能謂凡以爲文化可以調和的人，便都是張之洞之流。但可惜主張調和東西文化的人全未能比較具體地指出怎樣來調和牠們。他們不但祇會空說取人之長捨己之短，不但未能指出何者是人之長，何者是己之短，即是在原則上他們也都忽略了一個問題。這便是調和的方式問題。請先言文化應如何調和。我們第一認爲文化可以分成單位，或 Traits。其次便又以爲採納另一文化時須以單位爲本，而這些單位是不容妥協的。你若採取某一單位，你便須全盤採取牠，而不容祇採取牠的一部份，一階段。但採取了這一單位之後，卻不見得必需採取其他任何單位。換言之，我以爲同一單位不能妥協，但

不同的單位却有許多可以同時並存。所以我所主張的，不是同一單位前後段的妥協，而是不同的單位的調和；不是縱的折衷論，而是橫的並存論。請稍言其詳。譬如，就治學來說，我以爲讀書不求甚解的態度是決不能與精確的縝密的科學態度相妥協的。在這裏我們如打算學西洋人就必須完全學他；不則完全不學，而不能在馬虎與精細之間取妥協態度。因爲你祗要稍微馬虎，你在結果上不但不能收效，並且還會闖禍的。工程師繪圖不容半點馬虎，物理家推測不容半點馬虎，數學家演算不容半點馬虎。在這裏你若有一點與他的不同，便可以使你完全達不到目的，而不是精細一半，可以得他們所得的一半的。依這種講法，我們可以說東西兩種治學的態度是冰炭不相容的。如不完全保守悠然自得的態度，便須整個接受他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但採取了科學治學方法，却不一定要學他們見了女人脫帽子。這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學了他們的精確治學方法，不再去學他們見了

女人脫帽子不見得就有壞處。

何以我必說就一單位講不能妥協呢？這是因爲我以爲文化在大體上是有因果相生的關係的。出發時走向那方面的，那末你的結果也必卽在那一方面。譬如我們都可以明白，若沒有希臘先哲的那種探索的精神（Searching mind），有一美國人做書名爲 The Searching Mind of Greece, Searching 一字恰足以形容希臘人的精神），若不是統制中世紀的希伯來文化，至終在十四五世紀被由義大利發動的復興運動，和在十六世紀被由德國發起的改宗運動給推翻，則我們敢信近代科學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沒有科學，因爲由孔孟之道裏不會產生出科學。所以在我們經過三四十年的適應西化的歷史後，我們才曉得，若學他們，便須自根本上學他們，須提住幾項要點澈底學他們。

所以祇廣汎地說，「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在我們

看來是不夠的。祇汎論東西文化調和，更不能使我們知道所指究係那一方面。由同一論點，我們可以見到將文化與文明劃爲截然的兩段，也含有很大的錯誤。若說文明是發明，文化是創造，也許還不失爲漂亮的措詞，至若謂文明是有世界性的，文化是有國別性的，便已含蓄了很大的錯誤，若更進而以爲文明是可抄襲的，而文化是絕對不能模仿的，便完全又陷入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兩截」（我想這「兩截」兩字比「二元」兩字好得多）西化論之窠臼了。我們翻來覆去所要指明的卽正是：就大體上講，有某種文化才會產生某種文明，而文明不是驀地產生的。比如沒有希臘文化便沒有近代科學的文明，或反過來說，祇有道，儒，佛的文化，却必亦無望得到科學的文明。文化文明相生的過程是如此，我們採納牠們時也要文化與文明同時並重，或甚至將注意力還要多放在文化上面！我們認爲非這樣從基礎上着手，從根本上着手，是學不好西人的。近若干年來的歷史

所給我們的教訓正是如此，四年前我在大公報現代思潮周刊發刊詞上卽曾指出，祇採取西人的應用自然科學，甚至他們的應用社會科學，是不夠的，而必須再發起一個「哲學的」（我在這裏用這名詞是包有極廣汎的意義的）運動，改造我們的文化（是的，文化而不祇是文明），才足以實現一個在大體上與歐美相同的社會！

我這裏所提出的同一文化單位不應妥協的說法，也許有許多小的事實不能解釋，如同就「穿衣單位」來說，中西便是可以並容的，穿了西褲革履，却也還可以穿一件長袍。然而我相信，除去這些皮相問題不算，其餘許多重要文化「單位」是應當採用我所提出的方式的。比如就 Weltanschauung，人生觀，倫理觀，社會觀等，據我看，若學西人，若以實現西方社會爲我們的理想，則我們必須整個學到他們，才足以生效的。並且在這幾方面 我們還須承認是要聯帶一齊都學的才好。

祇利用「文化單位」等名詞來表現我的意思，也許有語病。我現在另換上一種說法。我所主張的可以說是從根上，或說是從基礎上的西化論。有許多皮相與枝節問題，如同還是打 bridge好，還是打麻將好，我以為可以不專去討論牠。我們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個改造我們的頭腦，而要將中式的頭腦換上一個西式的頭腦（Western type of mind），由一個「論語」式的頭腦，換上一個栢拉圖「共和國」式的頭腦。同時我們有許多基本觀念，深入我們的腦筋如此之深，牠們已經成了刻入而固定的條紋，溝渠。我們的思想與活動已整個被這些溝渠給限制住，我們不動則已，一動便滾入這些溝裏去，我們若不澈底從根上改造，我們是永也逃不開那些陳舊却很有力的窠臼的。如果精神與物質是可以分開來談的，我寧可將 emphasis 放在精神改造方面。

我已經說我與全盤西化論是非常同情的。我與全盤西化論的不同祇在我看中

西文化間多少有「質」的不同，而不祇是「程度高下的分別」；祇在我看西方文化有實質與表象之分，祇在我將注意力放在實質的採納方面，而不將實質與表象等而視之。

我不願將我個人劃入取長捨短的調和派內，便因爲我主張重根本上從實質上西化的。我認爲在基本文化單位方面是無所謂長短的。如果我們以西方社會爲理想，我們便必須對這些單位全盤接受。

（五）

在全文未結束之前，還有兩個問題需要幾句簡略的討論。一個是怎樣具體採納西洋文化的問題。固然我們須承認西方文化有牠的「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性質，共同的要點」，但爲實用，却也不是祇表示一種對西方文化的態

度便算了事的。比如我們如打算利用教育來實現我們的從根本上西化的信念，我們便須拿出一個比較具體的系統來。我們便須對許多問題給一個確定的回答。譬如政治制度問題，雖然我們同時可以相信民主與獨裁之間有牠們的共同基礎，而我們應當注意到現代公民的訓練等等，但究竟我們是要二者之中的那一種，却恐怕也不能完全避開不談的。這便是一個整個教育哲學的問題，爲解决這個問題，我在旁處曾再次主張設立一個超官式的教育目標研究院。

另一問題便是，我們既非喪心病狂何以非主張從根上西化不可？爲回答這問題，我不敢隨從陳序經先生對西洋文化做無保留的稱讚。東西文化到底那個眞好，這是內在的價值問題，而不是可以用功用名詞（functional terms）來做滿意回答的。但祇用功用名詞却已經可以回答我們的爲甚麼須從根本上西化的問題，而無須冒險牽涉到文化內在價值問題。然則爲甚麼我們主張要從根本上西化？因

爲我們四萬萬人如想繼續在這世上生存，便非西化不可，而欲求西化則祗有從根上西化才足以生效！我們是被逼西化，被逼從根上西化。近幾十年的敎訓是，我們最聰明的辦法，便唯有誠意地，老實地，爽快地，不忸忸怩怩地從根上西化。我與主張保存國粹以圖立國的人正正相反，我深信從根上西化才是我民族的出路。這已是一條很有力的理由，如果西洋文化在價值上也是優越的，那自然更好。

二四、三、二十七。

（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

論文化的創造

——致張季同先生——

沈昌曄

自海上十教授發表一十宣言以來，各地響應，紛起討論，可惜我沒機會讀。今天偶然讀到張季同先生的「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文章，我想來拉雜地說幾句話，算不得討論。

中國文化需要建設起來是毫無疑義的；建設中國文化須以中國爲本位，也是不易的原則。這點我無話說。但如何建設却是問題，也便是我要說的。

觀張先生對於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有幾句扼要的話。他說：

「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更顯明的說，其實可以說是『文化的創造主義』。不因襲，亦不抄襲，而要從新創造」。

因爲不因襲，所以張先生反對復古；因爲不抄襲，所以張先生反對純歐化。

他說：

「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一方面不要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而歸於消亡，使中國仍保持其特色的文化；同時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相適應，使中國文化變成新的，而成爲新的世界文化之一部分。」

這段話便是張先生反對復古反對純歐化的釋解。但既不因襲，又不抄襲，如何從新創造呢？張先生主張：

「兼綜東西兩方之長，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調和，而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

原來張先生想在半因襲半抄襲的總和裏來一下「創造的綜合。」

這是張先生文章中的主要點，我已引過來了。張先生的主張，自然很合我們中國人的中庸思想，驟看的確很對，但細細一想，便覺好聽而不實惠。不復古，不純歐化，而可在部分的復古與部分的歐化的綜合中創造出新的文化來，這多麼好！可是，我想根本的問一句，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同時採納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果有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嗎？

對於這一個問題，張先生當然是以爲可能的。在談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得先知道張先生所要發揚的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是什麼，所要採納的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又是什麼，始可判斷其有否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的可能。張先生也說：「欲使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意義變成淸楚的，還須考察：過去的中國文化是什麼？中國文化的特色在那裏？世界文化之大流是趨於何方？中國所缺乏卽所需者是些什麼？不然，所謂中國本位文化的觀念還是漠忽不淸

的。」

張先生指出中國文化有四點，第一中庸的行爲態度，第二人倫之注重，第三農業，等四士大夫統治。這四點，張先生以爲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但張先生聲明這些是中國文化之過去階段的特點，不需要發揚。於是張先生要另找出固有的卓越的值得發揚的中國文化特點，但是，張先生含糊了。他一則說：「這似乎難以說沒有；」再前說：「中國文化的根本的一貫的性徵，其實很難說，勉強說，或者可以說中國文化是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罷。」張先生雖則以勉強的態度與虛擬的口吻把這一點中國文化的特徵說出來，有點像不敢承認似的，但至少幷沒否認；而從張先生的「中國文化是特重正德，西洋文化則特重利用」的話看來，好像他以爲西洋文化是不注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的。所以，張先生認爲應採納的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貢獻，便只有「利用」之學了。他指出西洋文化的大貢獻，

如科學，工業，集團生活，「力」的思想，都是中國所需要即所缺乏的。

好了，張先生所謂「兼綜東西文化之長」，要是我並不誤解的話，原來是發揚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而採納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張先生說過，中國本位的文化是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可同日語的；但經他這樣具體的說明，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話，實只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我找不出其中有什麼大不同之處。雖則張先生不主張「平庸的調和」，主張融合爲一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是與「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不同的。但是，我以爲，要把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同時與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作一種「平庸的調和」，已是做不到，要作一種「創造的綜合」更不可能呢！

我們可以承認「人性之發揮與改進」是中國文化的性徵，但我們不能不承認西洋文化並未忽略了這一點。西洋人的「正德」並不比中國人差，提倡禮義廉恥的新

生活運動不在西洋發生而反在中國。西洋文化的精神，何嘗不注重「心的改造」！不過，西洋文化是以物境改變心境，是實際的；而我們中國則只是一種玄之又玄的說教。因爲西洋文化的精神是實際的，所以西洋有發達的科學等；而中國文化之所以停滯不進，與對科學之所以不注重，也正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有以造成。

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精神有其根本上的不同。這不同的程度並不跟法國文化與德國文化之不同相等。德法文化雖不一樣，但其文化基點却是相同的。中西文化便不如此，根本精神不同，發展的方向不同，歷程不同，整個的文化體系也隨之不同。以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有融合爲一的可能嗎？況且，西洋科學之發達，與中國對科學之不注重，既有其文化歷史上的必然性，現在僅採納西洋文化中之科學等之一部分，而同時又保持中國文化固有之性徵，怎麼能相應呢？

我以爲「心的改造」與「物的改造」不是兩件事，不能分開獨立的。推張先生的

意思，也許以爲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已是很卓越的了，現現只要發揚，再採納些西洋的有價值的精良的「物的改造」文化使綜合之，便內外二面俱到，可以由此創造新的文化了。要是文化的創成眞能這般容易，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可惜文化不是算式，可以互相加減的。每一種獨立的文化，都有其整個的體系。要從兩種獨立的文化裏求其產生新的文化，應該是兩個文化體系的結婚，而不是部分的綜合。文化是有機體，有其不可分性。我不能承認文化可以區分爲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兩類。「精神」與「物質」只是整個文化的二面，「精神」是「物質」的泉源，「物質」是「精神」的表現，失其一，便二者俱失，沒有脫離了西洋的「心的改造」文化而能使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存在的道理。但張先生的主張却正是想把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投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裏來，這樣，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在中國將失其存在的原動力而死亡，又怎能同時和中國的「心的改造」文化融

合爲一呢？採納方面既失敗，卽使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能如願的發揚，那所獲得的也只是中國固有文化罷了，又何從創成一種新的文化呢？所以，張先生說得雖好聽，要把兩者作一種「創造的綜合」，但事實上同時融合既不可能，新的文化便創不成，所謂「創造的綜合」一語也便懸了空了。

我這話想張先生必不以爲然。張先生會說我所敘述的近乎「平庸的綜合」，（不是「調和」）不是他的「創造的綜合」的原意；張先生曾說他所謂「創造的綜合」是着重在「創造」二字。要是張先生眞是這麼意思，那末，我得說，創造是需要原動力的！把中西文化創造的綜合，我不否認其有可能性，但斷不是半因襲同時又半抄襲地所能做得到的。我說可能，是指在中國已創成了新的文化以後，那時有豐富的創造力，可以做到中西文化「創造的綜合」！或者竟可以說是「創造的融合」。但這和張先生的主張不同。張先生是以中西文化的「創造的綜合」來建設中國本位

的文化，來創成一種新的文化，這時候的中國有創造的力嗎？所採納的西洋的部分的文化既將因和中國固有的文化不能融合爲一而死亡，不能給中國以創造的力；而中國固有的文化，老實發揮不出創造的力來了，何從談得到「創造」呢？

張先生如不信，我們可以看一看當前的事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萎靡到如何地步？是否能發揮得出創造的力？發揚了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是否能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以一種新的力量而趨於創造？中國以前也曾採納過西洋文化，雖不曾提出「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樣明確的口號，但在所採納的西洋文化中自然地　雜有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這兩者的混合又是怎樣的結果？是否有過創造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採納了西洋的民主政治，似乎應該民主化了。但因爲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仍混入在民主政治中，中國之採納民主政治，並不曾把西洋的民主政

治精神也同時消化過來。於是，中國的所謂民主政治，仍不脫張先生說的「士大夫統治」的特色；而只是把中國固有的政治換了一套外衣，什麽都是因襲以前的精神。而因爲這種精神之日趨低落，在政治上的表現反更加厲的腐化，這是一點。又如中國試行新教育制度，模法做美，從規範典章上看，這是歐化了；從實際上看，仍是發揮中國固有的人性，誰能說法國美國的教育有如我國那樣糟呢？這又是一點。甚至如共產黨，這個歐洲的產物，在中國也有人採納過來了，但有人說中國的共產黨是封建的共產黨，其根本還仍是想做大阿哥，爭權奪利，並不比旁的集團兩樣，一樣的仍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

從這些事實的告訴，我們可以知道所採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是怎樣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所殺死，同時反映出中國的舊精神是怎樣的要不得，怎樣的在中國現存文化中植着根深蒂固的基礎！這種舊精神，以之殺死所採納的脫離了西洋精

神的「物的改造」文化有餘，而以之融合西洋文化如張先生所說的而創成一種新的文化，則根本沒有這力量。張先生當不會否認那些所採納的是西洋文化的貢獻吧？然而爲什麼在西洋行有成效的制度文物到了中國便成了一團糟呢？有人感歎着「橘逾淮爲枳」，殊不知橘之所以變成枳，正是中國現存文化的精神作怪。這種精神如不根本剷除，則中國的一切只趨於腐爛，中國的文化只趨於沒落，能發出創造的力來嗎？

在主張保持或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精神的人，對此自然會另有一番解釋，以爲西洋文化搬到中國來之所以失敗，一是因爲宜於西洋的未必宜於中國，不合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在中國生適應作用；一是因爲雖宜於中國而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即所特重的「心的改造」文化不會發揚，所以不能產生創造的力，作一種「創造的綜合」，以創成新的文化。

由第一種解釋看來，這是很顯明的說，採納西洋文化須以與中國的意識形態能適應與否爲標準。西洋文化之不能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相適應，因爲中西文化的精神根本不同的緣故，這並不是意外的事，我已說過這兩者是不能同時融合爲一的。但我們得知道，中國的意識形態是給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所支配的；同時我們又得知道，因爲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能適應現時代的世界潮流，所以我們得採納西洋文化。要是採納西洋文化須以中國的意識形態之適應與否爲標準，那末我們根本不必採納，現存的中國文化不是更能適應中國的意識形態嗎？要是我們承認中國須適應世界潮流而有採納西洋文化的必要，那末，我們便不必顧到在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支配下的意識形態如何，應先求適應西洋文化，以改變原有的意識形態，而對於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予以嚴厲的排斥。

由第二種解釋看來，對於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也致不滿，但想以中國固有的

卓越的「心的改造」文化來替代，以與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相綜合。我們姑不問這兩者是沒有融合的可能，實在，要以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來淘汰中國現存的要不得的文化精神，也不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爲中國現存的文化精神正是由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所嬗變下來的，不是憑空掉下來的。現在再來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恐反意外地使這些要不得的精神能多站幾時。其結果也將如上所說的中國舊精神仍　入在所採納的西洋文化中而把有價値的西洋文化變成一團糟一樣，仍不能淘汰中國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的。而且，以前接受西洋文化是只想把中國文化推動到新的階段去，並不會有意發揚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如張先生所主張的）這種舊精神尙且如此無孔不入，現在若發揚起來，這種舊精神更有所遮掩而乘機活躍，而所採納的部分的西洋文化更不足以淘汰這些舊精神，只落得一襲「外套」了！

中國的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既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自然難以一言便把這些舊精神淘汰。張先生以爲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已經隨過去階段文化的過去而終結。但事實上以前採納西洋文化時，這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卽我所說的舊精神，不但仍羼入作怪，而且還具有不拔的基礎。有人以爲以前採納西洋文化之所以失敗，是在於對西洋文化囫圇吞棗，好新騖奇，沒有眞確的認識的緣故，這倒是對的。但這不足以說明以前採納西洋文化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爲中國的舊精神的緣故，反之，囫圇吞棗，好新騖奇，沒有眞確的認識諸弱點，正是中國舊精神的反映。下意識地以這種精神採納西洋文化，自然不會深入，不會把整個西洋文化的精神一併採納過來，已難望其能有好的結果，採納過來後，又加以只求消極的適應，不肯作積極的奮鬥，遇困難卽灰心，喜做表面文章，不思實際努力種種中國舊精神的弱點；這樣，西洋文化在中國怎能不糟!?而在另一方面正可以看出中國的

舊精神在中國必須突入新的文化階段這時候，並不會終止。

本來，文化的階段是不能一刀就劃分得淸淸楚楚的。在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舊精神必然會遺留着，一時不容易做到不因襲。張先生是主張「不因襲」的人，但他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理論，正是有中國歷來的中庸思想做背景的。要是沒有中國固有的中庸思想，恐不至產生張先生的理論。張先生雖以爲中庸的行爲態度是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但仍於不知不覺中受其影響。可見中國文化的舊精神已經終結，只是理想的說法。

因爲舊精神之未曾終結，因襲觀念之不易一時免除，而同時對於世界文化必須適應，中國必須突入新的文化階段，新的文化必須以世界文化之最高原則爲原則，所以對於這已消失了創造的力使中國文化沒有了生氣的舊精神必須使其終結，同時必須培養足以適應世界文化富有創造力的中國的新的精神。對於張先生注

意於世界文化之大流是趨於何方，對於張先生的「文化的創造主義」的本意，我是贊同的。但張先生一誤於認兩個文化體系根本不同的中西文化有同時融合爲一的可能，又誤於認中國過去階段文化的特點，已隨過去階段文化的過去而終結；張先生沒有注意到文化的不可分性，也沒有注意到阻碍創造的舊精神仍行存在，更沒有注意到新的精神的培養；因之張先生雖說「文化的創造」，却走的是一條絕路。我們必須把新的精神培養成了，才能淘汰舊精神而使之終結；也惟有把新的精神培養成了，才能發生創造的力，實行「文化的創造主義」，使中國文化變成新的而成爲新的世界文化之部一分。

這新的文化精神如何培養成呢？我們可以從五四運動的成績得到一個教訓。以前採納西洋文化，因爲舊精神的作怪，不曾把整個的西洋文化採納過來，致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脫離了西洋的「心的改造」文化，不能與中國的舊精神相融

，而又不能與中國的舊精神相敵，反給舊精神所支配而變成一團糟。要是那時把整個的西洋文化體系採納過來，雖則要起嚴重的衝突，但衝突的結果將使中國的舊精神沒落，而養成一種可以適應世界文化富有創造力的新的中國精神。五四運動之所以能使中國人的思想一變，便是因爲那時介紹西洋文化尙不至零星批發，而有整個的認識，一面既向中國的舊的一切投以炸彈，一面又灌輸中國的青年以新的思想，從而發出新的精神。假使持之以久，不難根本掃除舊精神而確立新文化。可惜的是後繼不力，舊精神的根底太深，方生的嫩芽不能迅速地長成，卒至於復古運動的抬頭。但五四運動給中國的影響已不能算小了，復古運動雖抬頭，可是如將近黃昏的太陽，終發不出什麼力量來。從這個教訓裏我們可以理會得中國的新的文化精神的養成，第一步須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

張先生或者以爲既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便無「中國本位」可言，我不是這

樣想。爲了中國的新的文化必須以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爲原則，爲了中國的新精神必須適應世界文化，爲了中國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遺產之不能淘汰現存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爲了同時兼綜中西文化之長之不可能，我以爲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實爲必要。因爲所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換言之，卽是應用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而以中國的新精神來建設中國的整個文化體系。現在所謂世界文化是以西洋文化爲代表，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以養成中國的新精神，正是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先聲。除了西洋文化，有那一種力能使中國培養成一種可以適應世界文化的潑剌剌的新精神呢？

我不否認中國有值得發揚的文化遺產，我也不否認中國從前有過創造的精神，創造過光榮的文化。但那時的創造力已隨那光榮的文化的沒落而消失了，到了現在僅遺留了渣滓，卽那些要不得的舊精神，再也不能恢復創造力了。因之，我

們對於我們中國固有的值得發揚的文化遺產，在新的精神沒有培養成以前，便難免爲舊精神所囿，做不到「不因襲」，而不能給以新的評價。發揚固有文化的口號也不是從今日始，幾曾發揚出什麼來，仍跳不出因襲的觀念的圈子裏。幾個比較有成就的人，大都是對西洋文化有根本認識的人，而不是僅僅採取西洋的「物的改造」文化的人。戀於中國固有的「心的改造」文化的人，對於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的改造，反助長其弱點而沒有成就。就這一點也可看出：即使僅爲發揚中國的固有的文化遺產，也須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

要是不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而在因襲的圈子裏發揚中國的文化遺產，也難以適應世界文化的。即使有幾點所謂卓越的文化的性徵，注射到這個犯危症的文化病人身上，因爲是固有的緣故，至多稍稍興奮一下，仍培養不成新的文化精神。即使再加幾種西洋的有價值的貢獻綜合投之，也因西洋的貢獻脫離了本體而失

其效力，投入之後，又敵不過這個文化病人的舊精神，自然一樣的難以養成一種新的精神。必須用西洋文化整個的體系注射下去，使這文化病人脫胎換骨，排斥了舊精神，然後，才能把新精神漸漸養成。而因爲這裏面的血是中國的，所以所養成的仍是中國的新精神，而不是西洋的，而可以與西洋文化相適應。有了這種新精神，不愁不發出創造的力量來。張先生不是說過：「中國人不是不會發明，是能發明能創造的，然剛發明一點，剛創造一點，便滿足了，便停止不進」的話嗎？這話正足以說明以中國的固有的文化遺產來創造中國的新文化是落空了。何況張先生還不能確定地找出該要發揚的中國文化的特色呢！這樣：不採納整個的西洋文化，又有什麼辦法？

　張先生是有「純歐化將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而歸於消亡」的疑懼的，我以爲這是一種錯覺。要使中國文化完全爲西洋所克服，除非是西洋人用一種强

大的壓力使中國西化、習而久之，也許要忘了自己。但這是被動的同化，而我們現在所說的却是自動的採納。而且所謂採納也只是養成中國新精神的第一步。採納了西洋文化，還須經過咀嚼，經過消化，去其渣滓，擷其菁華，並不是完全的模倣。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模倣西洋文化是中國突入新的文化階段的第一步。譬如學畫，得先從臨摹學起。倘如怕臨摹要與所臨摹的同化，則根本畫不好自己的畫，根本不能自樹一幟。我們採納西洋文化的態度也是如此。而因為文化有其整個的體系，有其不可分性，故第一步的採納也須從整個着手，不能只採納西洋的所謂「物的改造」文化。這種全盤西化並不是死路一條，而是必經的途徑。況且，文化是有惰性的，臨摹的成績一定不能與所臨摹的對象一樣。文化的進展又是蛻化的而不是突變的，不能一說全盤西化，便會如變戲法般當卽就全盤西化，正如說採納幾種西洋文化，也不能一說採納使可馬上採納過來而毫無遺漏一樣。提倡

了十分，所得也許只有一半，若提倡了一半，所得恐只皮毛。這其間經過新舊的衝突，時間的與空間的選擇。中國的舊精神有其文化歷史的根據，張先生正不必担心採納了整個西洋文化能使中國文化爲西洋所克服而歸於消亡。相反的，西洋文化整個的力量與中國的舊精神衝突激盪的結果，將使中國的要不得的舊精神淘汰．而在純粹的中國血中孕育成與西洋文化相適應的新精神。

這種新精神由孕育而培養而獨立，其間自須經過相當的過程。其先只求適應西洋文化，迨完全吸取了西洋文化的精髓，經過了良好的消化，才能漸趨於獨立。有了獨立的新精神，才能發出創造的力，才可談到創造。西洋文化不是盡善盡美，現在也正在向未來的光明之路進展。這一個未來的世界的文化園地裏，正有發揮我們中國的創造力的餘地。我們便可因這一種獨立的新精神的舒展而創成了中國的獨立的新的文化體系。我們又可因這一種獨立的新精神的舒展，對於中國

固有的文化，有從新的目光下所產生的新的評價，發掘其可以適應時代的而發揚光大之，作到與西洋文化「創造的融合」。那時我們的中國文化，將以豐富的內涵，偉大的創造力，而給新的世界以有價值的貢獻。而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雖不言建設，也將自然地建設起來了。要是如張先生的主張，名義上雖是以「創造的綜合」的方式使中西文化之長融合為一，實際上融合既不可能，創造又無力量，不啻是半因襲半抄襲地，「平庸的調和」尚做不到，怎麼能做到「創造的綜合」呢？

所以，我以為現在文化界的領袖們，應放大了胆來做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以培養中國的新精神的運動。不應怕全盤西化有成為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險而不敢，却應以大的魄力駕馭整個的西洋文化，使中國採納後的消化有良好的經過。這是創造中國新的文化的出路！我們不應只為適應這一個時間這一個空間而自限於時空之中，文化是有向上性的，我們應該發揮文化的力量以改變這一個時空。

我的話嚕嚕嗦嗦夾七夾八說得多了，說得不明白處，是我沒有說話的藝術。現在把我的意見再概括地說一說。

我的意見是：

一、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須以世界文化的最高原則爲原則，而以中國精神赴之。所以一面須趨向於整個世界文化的動向，一面須先求中國精神與此趨向相適應。

二、現存的中國精神不足以適應世界文化的趨向，更不足以創造新的文化，而反足以阻碍時代的進展，所以必須淘汰現存的中國精神，而培養中國的新精神。

三、中國固有的良好的中國精神，因已有過極度的發展，有過光榮的歷史，再投入現存的精神中也發揮不出新的力來；現存的精神正由固有的嬗變而來，發

揚中國固有的文化遺產仍不足以淘汰舊精神而培養新精神，仍不足以適應世界文化之趨向，所以此舉在現時無需要。

四、世界文化的代表者是西洋文化，所以中國新精神的培養，應借助於西洋文化之力，也惟西洋文化能淘汰中國要不得的舊精神。

五、文化有其整個的體系，其外面的表現不能與其內在的精神分離。要是綜合中西文化之長，一面將因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反足予現存的精神以助力，一面又因西洋的科學等脫離其固有精神而失其效力，不能與中國精神融合為一，而又無力排斥中國的舊精神；舊精神發揮不出創造的力，自也做不到「創造的綜合」，所以我不同意這辦法，要採納西洋文化，應從整個着手。

六、採納整個西洋文化，因仍有中國的舊精神與之衝突激盪，又因文化的惰性，舊精神雖逐漸淘汰，而西洋文化經時間空間的選擇，經中國的消化後，將不

再是西洋的，而變成中國的，所以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不足以消亡中國文化，而中國之新精神却因之由萌芽而培成。

七、中國有了獨立之新精神，一面便可由此新精神的鼓動，而發出創造的力，看清世界文化之趨勢，迎頭趕上西洋文化以推動時代；一面又可以新的眼光給中國固有的文化遺產以新的評價，擇其可以適應者而發揚之，以充實內涵，這樣，中國本位的文化才可以確立的建設起來。

不思培養中國的新精神，或培養不得其道，對於文化的創造都是沒用的。張先生以爲如何？

二十四，三，二十九，上海。

（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

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胡適

新年裏，薩孟武何柄松先生等十位教授發表的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在這兩三個月裏，很引起了國內人士的注意。我細讀這篇宣言，頗感覺失望，現在把我的一點愚見寫出來，請薩何諸先生指教，並請國內留意這問題的朋友們指教。

十教授在他們的宣言裏，曾表示他們不滿意於「洋務」「維新」時期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見解。這是狠可驚異的！因爲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正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最新式的化裝出現。說話是全變了，精神還是那位勸學篇

的作者的精神。「根據中國本位」，不正是「中學為體」嗎？「採取批評態度，吸收其所當吸收」，不正是「西學為用」嗎？

我們在今日必須明白「維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也不完全是盲目的抄襲，他們也正是要一種「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他們很不遲疑的「檢討過去」，指出八股，小脚，鴉片等等為「可詛咒的不良制度」；同時他們也指出孔敎，三綱，五常等等為「可贊美的良好制度，偉大思想」。他們苦心苦口的提倡「維新」，也正如薩何諸先生們的理想，要「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他們的失敗是薩何諸先生們在今日所應該引為鑒戒的。他們的失敗只是因為他們的主張裏含的保守的成分多過於破壞的成分，只是因為他們太捨不得那個他們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國本位」。他們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所以他們的維新政綱到後來失敗了。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帝制推翻了，當年維新家所夢

想的改革自然在那大變動的潮流裏成功了。辛亥的革命是戊戌維新家所不敢要求的，因爲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豈不要毀了那個「中國本位」了嗎？然而在辛亥大革命之後，「中國本位」依然存在，於是不久大家又都安之若固有之了！

辛亥以來，二十多年了，中國經過五四時代的大震動，又經過民國十五六年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的大震動。每一次大震動，老成持重的人們，都疾首蹙額，悲歎那個「中國本位」有隕滅的危險。尤其是民十五六的革命，其中含有世界最激烈的社會革命思潮，所以社會政治制度受震撼也最厲害。那激烈震盪在一剎那間過去了，雖然到處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痕，始終沒有打破那個「中國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們却至今日還不曾擱下他們悲天憫人的遠慮。何鍵陳濟棠戴傳賢諸公的復古心腸當然是要維持那個「中國本位」，薩孟武何炳松諸公的文化建設宣言也只是要護持那個「中國本位」。何鍵陳濟棠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盤復古：他們購

買飛機槍砲，當然也會挑選一九三五的最新模特兒；不過他們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聖經賢傳來教人做人能了。這種精神，也正是薩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捨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儘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復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調和的烟幕彈之下。對於固有文化，他們主張「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對於世界新文化，他們主張「取長捨短，擇善而從」：這都是最時髦的折衷論調。陳濟棠何健諸公又何嘗不可以全盤採用十教授的宣言來做他們的烟幕彈？他們並不主張八股小脚，他們也不反對工業建設，所以他們的新政建設也正是「取長捨短，擇善而從」；而他們的讀經祀孔也正可以掛起「去其渣滓

，存其精英」的金字招牌！十教授的宣言，無一句不可以用來替何健陳濟棠諸公作有力的辯護的。何也？何陳諸公的中心理論也正是要應付「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建立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

薩何十教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認識文化變動的性質。文化變動有這些最普遍的現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種文化既成爲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

第二，凡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比較觀摩的力量可以摧陷某種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與抵抗力的一部分。其被摧陷的多少，其抵抗力的強弱，都和那一個方面的自身適用價值成比例：最不適用的，抵抗力最弱，被淘汰也最快，被摧陷的成分也最多。如鐘表的替代銅壺滴漏，如槍砲的替代弓箭刀矛，是最明顯的例。

如泰西曆法之替代中國與回回曆法，是經過一個時期的抵抗爭鬥而終於實現的。如飲食衣服，在材料方面雖不無變化，而基本方式則因本國所有也可以適用，所以至今沒有重大的變化：吃飯的，決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決不能全改用刀叉。

第三，在這個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標準可以用來指導整個文化的各方面的選擇去取。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在這種鉅大的文化變動上，完全無所施其技。至多不過是某一部分的主觀成見而美其名爲「科學方法」而已。例如婦女放脚剪髮，大家在今日應該公認爲合理的事。但我們不能濫用權力，武斷的提出標準來說：婦女解放，只許到放脚剪髮爲止，更不得燙髮，不得短袖，不得穿絲襪，不得跳舞，不得塗脂抹粉。政府當然可以用稅則禁止外國奢侈品和化裝品的大量輸入，但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

的裁判官的，因爲文化的淘汰選擇是沒有「科學方法」能做標準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這就是古今來無數老成持重的人們所恐怕要隕滅的「本國本位」。這個本國本位就是在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習慣；簡單說來，就是那無數無數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個本位是沒有毀滅的危險的。物質生活無論如何驟變，思想學術無論如何改觀，政治制度無論如何翻造，日本人還只是日本人，中國人還只是中國人。試看今日的中國女子，脚是放了，髮是剪了，體格充分發育了，曲線美顯露了，但她無論如何摩登化，總還是一個中國女人，和世界任何國的女人都絕不相同。一個澈底摩登化的都市女人尙且如此，何況那無數無數僅僅感受文化變動的些微震盪的整個民族呢？所以「中國本位」是不必勞十敎授們的焦慮的。戊戌的維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時期的潮流，

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動搖那個攀不倒的中國本位。在今日有先見遠識的領袖們，不應該焦慮那個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該慮焦那個固有文化的惰性之太大。今日的大患並不在十教授們所痛心的「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徵」。我們的觀察，恰恰和他們相反。中國今日最可令人焦慮的，是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太多了，太深了，所以無論什麼良法美意，到了中國都成了踰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態，從娘子關到五羊城，從東海之濱到峨嵋山脚，何處不是中國舊有的把戲？社會的組織，從破敗的農村，到簇新的政黨組織，何處不具有「中國的特徵」？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從讀經祀孔，國術國醫，到滿街的性史，滿牆的春藥，滿紙的洋八股，何處不是「中國的特徵」？

我們愚見是這樣的：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可以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們肯往前看的人們，應該虛心接受這個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後的精神文明，讓那個世界文化充分和我們的老文化自由接觸，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氣銳氣來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將來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當然是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那是毫無可疑的。如果我們的老文化裏眞有無價之寶，禁得起外來勢力的洗滌衝擊的，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

總之，在這個我們還只僅僅接受了這個世界文化的一點皮毛的時候，侈談「創造」固是大言不慚，而妄談折衷也是適足爲頑固勢力添一種時髦的烟幕彈。

（三月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後

陳序經

五月十四日大公報登載十敎授的『我們的總答覆』一文。我讀了之後，覺得他們在這篇文裏的態度，比起他們在本年一月十日所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裏的態度，已經變得很利害。同時他們對於全盤西化論，表面上雖加以批評，骨子裏已經有意或無意的趨在這條路上。我現在且把他們的態度的變化與趨向，略爲解釋。

十敎授在『宣言』裏固說『不守舊』，但事實上，却偏於復古，因爲他們所說的『中國本位的文化』不外是像：

日本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强烈，但若日本畫

沒有那種刺目强烈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書』。

我以爲若照這種邏輯推衍起來，結果是比方中國女子之所以爲中國女子，就是因爲她們有小脚，奉『三從四德』；中國男人之所以爲中國男人，就是因爲他們嗜鴉片，能『左抱右擁』；中國船之所以爲中國船，就是因爲用帆駛；中國車之所以爲中國車，就是因爲用騾拖。這麼一來，凡是中國的固有文化，都要保存，而成爲復古了。

我並非不知道十教授在『宣言』裏曾有『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的詞句；然而十教授不要忘記：假使這種東西合璧的辦法而能謂爲中國本位的文化，那麼全盤西化，也可以叫做中國本位的文化了！因爲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既能容納一部份或大部份的西化，也能容納全盤西化。不過這裏所說的中國本位的文化，無異等於所謂西化或全盤西化，是指着中國而言；而其結果沒有什麼意義，因

爲無論何人，都會明白我們所謂西化或全盤西化，是指着中國而言呵！

十敎授在『總答覆』裏，雖則仍像在『宣言』裏以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是『要合此時此地的需要』，可是他們所謂『此時此地的需要』，現在却已變爲(一)充實人民的生活，(二)發展國民的生計，(三)爭取民族的生存。我以爲從文化的立塲來看，這三種需要，在名詞上固是不同，在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第二項以至第三項，都可以說是包括或依賴於第一項。至少二三兩項與第一項是不能分離的。十敎授在第一項裏既顯明的說『中國人民的生活，非常貧乏，物質方面不消說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嘗豐富』，那麼十敎授不但承認在文化的物質方面，我們要西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我們也要西化了。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要西化，豈不是成爲全盤西化嗎？

我已說過，十敎授在宣言裏的態度是偏於復古的。就使我們承認了他們的

『存其所當存，吸收其所當吸收』的標語，他們也跳不出折衷派的圈子。現在在『總答覆』裏，他們不但反對『任何復古』，而且反對各種折衷。所謂『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闕，簡直是自覓死路』，是很明顯的指出現在所遺留的多少的固有殘闕，也要掃除，所謂『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是很肯定的排斥整個固有的文化。那麼十教授在這裏不但放棄了日本畫家的理論，而且放棄了『存其所當存』的態度了。

十教授說：『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便有什麼體』，又說：『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根本不能分離』。這種理論，本是我們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的理論，我很奇怪十教授現在也能承認。十教授既不反對西化之用，則採納人家之用，不能不採納其體；十教授既不反對物質西化，則採納人家的物質，不能不採納其精神。這樣看起來，試問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折衷派的支流雖不少，但大概上，我們可以說：從一八六五至一八九四的三十年中，國人對於西化的態度，可以薛福成的『道的文化（中）與器的文化（西）』來代表。從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四的二十年的中表，國人的西化態度可以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與西學爲用』來代表。從一九一五到現在的二十年中，國人的西化態度可以最流行的『精神文化（中）與物質文化（西）』來代。道器之說，現在固少有人注意，其在當時，也因復古勢力太大，不易流行。至於體用之說，及物質與精神的論調，都可以說是四十年來一般折衷派的護身符。十教授現在既一脚踢了『任何企圖的復古』，又一拳打了所謂『金科玉律』的折衷論調，而相信文化不能分得開的理論，難道十敎授還不承認他們是跑在全盤西化的路上嗎？

我已指出十敎授的總答覆是趨於全盤西化的路上。現在且來答覆他們對於全盤西化論的批評。

十敎授說：『貿然主張全盤西化，豈但反客爲主，直是自甘毀滅』。關於這一點，我用不着把十敎授的總答覆裏的話，去反駁他們自己。即退一步而把十敎授的『宣言』來講。十敎授既說『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皮毛的辦法』，那麼十敎授至少願意吸收西洋文化之一半，或多半，而至多不過願意保存中國文化之一半，或少半。這麼一來，十敎授也豈不是『甘自毀滅』了一半，或多半的固有文化，而打破主客之分，或是『反客爲主』嗎？

十敎授既不明瞭所謂社會主義的文化與資本主義的文化有了一種共同的基礎或性質，又不能具體的指出，這兩種文化有了什麼根本的差異。同時好像忘記了這兩者都是西洋文化。我的意見是：現在人們所謂社會主義文化的國家，不但在外交上，正與所謂爲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國家力求合作，近來連了憲法也要從後者採納過來！此外無論在科學上，在工業上，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在根本上都找

不出什麼差異來。

十教授說：『敢問全盤西化論者，從何化起』？我的回答是：七十年來的中國，在文化的各方面，如教育科學等等，雖然比不上西洋各國，但是已經西化，而且有了多少進步。所以『從何化起』這個問題，大概上是無關重要的。我以爲我們在消極方面，苟能不做復古夢想，不做折衷空談，以免阻止西化的發展；在積極方面，苟能特別努力西化，那麼今後所得的進步，必當更多。我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已經說明全盤西化比之復古與折衷，都較爲具體，較易採納。假使十教授不相信我這話，我願意回敬一句道：敢問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者從何建設起？

十教授之所以不滿意於全盤西化論，不外是上面所舉出的三點；可是事實上，這三點都可以說是無的之矢。於是我們更可以明白，十教授已有意或無意的趨

於全盤西化的路上。

末了，我願意摘錄我在獨立評論一四九號所發表『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一文裏幾句話，以爲本文的結論。

我以爲西化這個問題，經過這一次討論之後，已有相當的共同信仰。這就是：我們應該全盤西化。至少這一次的討論的趨向，是在這條路上。

（五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我們的總答覆』書後

嚴旣澄

向『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的十位起草者進一言

說話的並不是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對於『社會』『文化』一類的大題目向來是不敢贊一辭的；這回忽然忘其固陋，爲此短文，實在是鑒於『中國本位』這四個字的惡影響眞個大得可驚，而就本報日前所發表王新命等十位先生之總答覆看來，原來提出這個名辭的人僅以此表示『中國此時此地所需要的』這點意思，那眞未免有點太不值得了。這十位先生之中，有幾位是我的熟人，平日對他們的思想和智識都是向來心折的。他們也許因爲太過側重了某方面的看法，以致一時想不到他們的話會有怎麼樣嚴重的影響；我站在旁觀者的地位，不能不提醒他們一下

。我的淺見只想請他們把『中國本位』四個字給取消了，把以後的討論集中到『今日的中國究竟應否全盤接受西方的文化』這一個題目上。這樣一來，也許會在事實上少產生一些壞的結果。

胡適之先生曾在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上指摘十位先生的宣言實際上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說。十位先生的總答覆否認胡先生的判斷，以爲他們與『中體西用』說之根本不同處在乎不承認精神與物質，和體與用之可以分開；他們認爲『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說什麼中體西用，簡直是不通！』但據我個人近來在許多人的口中和筆下觀察所得，他們的這種分別是不大容易得到衆人的理解的；許多人都祇知道『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說就是截長補短說，其辦法就是以中國固有的文化爲主，而吸收西洋文化之所長以補助之。還有人更進一步而討論到中西文化的優劣比較的問題，例如北平市各名流舉行第一次『中國本位文化建

設座談會』於公園水榭之時，便有某院長說到今日到會的人大多數都穿着中國衣服，可見還是主張中國本位文化者爲較多的話（根據報載），而且當時到會者所發言論，也大都側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發揚，這就與中體西用說無甚差別了。可見這個看法是很普遍的，而那天也參加座談會的宣言起草人之一陶希聖先生却並未曾明白矯正各位發言人的誤解——依他們現在的總答覆說，這個看法便成爲誤解了——以致我在未讀他們的總答覆之前，心裏也老是疑惑他們的主張和中體西用說並不見得有多大不同處，我所謂形勢很嚴重的惡影響，也正是指那些從這個普遍的誤解產生出來的言論和現象而言。如今讀了這篇總答覆之後，總算明白了他們的眞意並不如此了，然而從他們的意義不十分顯明透澈的文字所產生出來的種種惡影響，却總是他們所應該負責的。就以他們這篇總答覆來說，我也很希望他們注意於下述的一件事實：中國的文人原來最喜歡在言語文字上繞圈兒，如「旣不

怎樣怎樣，也不怎樣怎樣』的這種文字上的遊戲，說起來是非常冠冕堂皇，而眞意所在有時候曾陷於虛無縹渺，例如孟子上解釋孔子所說的『中行』，『狂』，『狷』，和『鄉愿』四等人物，中行(孟子叫作『中道』)是最高的，狂與狷次之，鄉愿是最不好的；孟子只解釋了狂狷與鄉愿三種人，狂是進取的，狷是不屑不潔的，而鄉愿則是『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的。他未曾說明中道是如何的一種人，却說明鄉愿與中道相似。後來解孟子的人便把這中道說成得乎狂狷之中，既不如狂者之一味狂，又不如狷者之只知狷的人，以爲如此解說方恰合『中道』的名稱；不知後之讀書者閉起眼睛來想一想他們所描寫的人的那種謹守繩墨，徘徊歧路，而無堅定的主見的情形，反倒成了一個鄉愿的最好的寫照了。我頗覺得近來的關於西化的論爭很可以拿來和這四種人相比譬：我們姑且命主張全盤西化者爲『狂』，主張閉關復古者爲『狷』，那

麼，中體西用說者可例以『鄉愿』，而作『總答覆』的那十位先生所自陳的態度亦可暫比『中行』。這樣一比，我們再來念念他們的這篇旣不這樣，也不那樣的文章，我們的眼前又不免現出一個『鄉愿』的影像來了——雖然他們自己說是極端反對鄉愿的說法的。

須知天下本來沒有如此恰滿人意的正中的位置，那只能認作一個理想的虛點。記得十幾年前，梁漱溟先生已經在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學』裏指出中國人的特質爲調和折衷；大概這種旣不這樣，也不那樣的態度就是這種精神的最澈底的表現。我們冷眼旁觀，覺得近年來似乎已有許多大事糊糊塗塗地的斷送於這種態度中。因循敷衍，至於今日，眼看這個龐大的民族旣不熱烈地求生，也不痛快地求死，結果只有半死半活不死不活地在那裏苟延殘喘。這種態度的來源便是中國人之想得太多，做得太少的老毛病。我們古代的聖人之所以不贊成三思而後行，也

正由於他知道想得太多的結果一定會成爲行得太少。在事情還沒有下手去做之前，先去把一切可能的流弊都想遍了，結果在畏首畏尾，徘徊瞻顧之餘，一定會連一步也不肯向前走。其實天下事絕不能盡如人意，看準了目前必需去走的路子，便只有勇往直前，走到那里算那里。就是明知道這條路中途會發生某種危險，也只好到那時再想法子去挽救。這總比停留在歧途口上去仔細揣摩那一條纔是萬靈的路好的多。調和折衷的精神，在中國整部歷史上所產生的結果，到如今總算起來，實在是壞的多，好的少。而到了今日，一切事變都以異常的速度把我們向前推擠，再沒有從前那樣豐富的時光留給我們去遲疑瞻顧了，於是這種精神便立刻產生出異常重大的壞影響來。例如在三十年前，已有許多學者看出非學西洋無以自存，在十多年前，已有梁漱溟先生明白指出今後中國的出路只有『全盤接受西方文化』這一條，然而進兩步，退三步，直到今天，還有這許多著名的學者在那

裏舌敝唇焦地辯論『中國本位』抑『全盤西化』的問題，而近一年來跟着這種辯論發生出來的復古的傾向更有沛然莫禦之勢，這都是我們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在那裏作怪。『宣言』的十位起草者既然『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取排斥的態度，』他們便應當注意中國本位的說法很容易被復古的國粹論者所利用，而且很容易把國人的這種徘徊瞻顧的根性勾引起來。結果就連他們所主張的擇善而從的局部西化也永遠達不到了。

而且據他們自己所找出來的，中國此時此地所需要的只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這三件事。試問這三件事果眞是中國所獨有的麼？就我看來，如今的國家恐怕就沒有一國不在努力於這三項事業，不但產業落後的國家要努力，就是『處於侵略者地位的列强』也無一不向着這方面走，不過還不如前者那樣地迫切罷了。既然是一切的國家所同有的問題，又何必憑空

以上是我要奉勸他們取消『中國本位』這個名辭的理由；以下再去批評他們的『貿然主張全盤西化，豈但反客爲主，直是自甘毀滅』的斷語。加上『中國本位』四個字？

我把十位『宣言』起草者的這篇總答覆仔細看過了兩遍之後，頗覺得他們的根本主張其實是和所謂全盤西化說大體相近的，祇可惜他們被這套繞圈兒的文字遮蔽着了，只圖理論上說得圓通，文字上說得痛快，就此模糊籠統地把自己的立脚點說成了一個大零號而不自知。他們說：『在縱的方面不主張復古，在橫的方面反對全盤西化；』『同時他們又明白指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根據這種說法，我敢請問諸位先生中國整個民族現時所能利用去解決這一項問題的工具和智識，除了從我們的祖先遺傳下來的和我們在最近二三百年來陸續向西洋學得來的以外，還有些什麼？對於前

兩項問題，如不求助於科學的發明，便只有守着我們的世代相傳的人力耕種和小手工業；對於後一項問題，如不求助於現代軍事智識和新式軍器，便只有依然運用我們的一刀一槍。試問中國人如今在整個生活系統和一切文物制度裏所有的，究竟有什麼東西是現代的中國人自己創造，既非祖宗的遺產，也非向西洋各國學來的？或者有人會舉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來；然而『三民主義』所包含的種種成分也是從『古』與『西』這兩方面搜集來的，孫先生只加上了一番綜合別擇的功夫而已。由此說來，他們十位先生的既不主張復古守舊，也不主張全盤西化的說法，豈不是剛好把自己平空懸掛起來，根本取消了自身的立脚點麼？至於他們所盼望達到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我只好借孟子的話說：『先生之志則大矣』，事實上一國文化之創造，恐非一手一足一朝一夕之間所能爲力吧。

總而言之，今日的中國正在掙扎於問題叢脞中，而一切解決問題之方法與工

具，除了西化，便是守舊，我們決不能在短期內找出第三條路來。即謂從今起，我們要決心去努力尋求這第三條道路，——就假定這是可能的話——那我們也總得利用原有的最精密，最有效的智識去下手；而至今日止，人類所能運用的最精密，最有效的智識要無過於西洋人所發明的科學，則仍是以西化爲出發點而已。

其實做這篇總答覆的十位先生又何嘗沒有看清白這一點淺顯的道理？他們既經舉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上述的三項問題的解決，他們自然知道最有效的解決這三項問題的方案和工具便是今世上所有的各科學家所繼續發明的種種新智識和新器械。他們絕不致承認在中國要解決這三件大事必需運用中國原有的東西——假如這是可能的，這三件事便不會成爲問題了。換言之，他們也早已看透中國一切原有的特質已經不適於此時，所以他們說復古守舊『簡直是自覓死路』。這一點原是最明顯不過的，中國之所以倒霉到這步田地，不就是由於中國所有的

特質不適於這個新時代麼？反之，世界『列強』之所以如此強盛，也只由於他們的特質恰好適應於此時。那麼，我們這個老大民族在這時期所能有的唯一的出路，豈不就是儘量去學人家的樣子麼？這也就是所謂全盤西化。不過『西化』這個名辭頗不適當，——如今世上的一切學問智識文物制度均已成爲世界的公器了，我們旣爲人類的一部，又何必爲了所居地點的關係而妄爲區別，把人類分劃爲東西兩部——而且很容易引起國粹主義者的反感，我以爲最好把它改爲『現代化』；『全盤』兩字也容易引起誤會，以致許多人會找一兩件根本無從化起的特質來質問我們，最好也改爲『儘量』二字。卽做這篇總答覆的十位先生似乎也不無從全盤西化四個字引起多少反感，所以會有『反客爲主』之言；其實西化就是現代化，因爲現代的强國都擁有這些制度文物智識學問，我們若要和他們並立於天地之間，便非學他們這些東西不可。要不然，我們自己先站不住脚，不必等人家來欺負

，自己先已筋疲力竭地躺下來了——如所謂經濟侵略之類。我們學會的東西越多，我們的抵抗力越大；等到有朝一日我們也學到和他們一樣之時，那我們便有力量反過來對他們瞪一下眼睛了。事實明擺在眼前，還有甚麼要討論的？所以我有一回曾經對一位國粹主義者的朋友說：『我現在就算完全承認你的話，凡是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值得永久保存的；然而在目前的强盜世界裏，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時候，我們總得把別人拿來欺負我們，剝削我們的種種東西先拿在手裏，然後能夠和他們一同生存。就算人家各國的文化都是壞到要不得的，我們也只好去學，因爲非如此不能自立。人家各國所同有的叫作通性，我們所獨有的叫作特性，我們如今所當作的事就是要努力習得人家的通性，然後以此來保守我們的特性——假定我們的特性都是值得保存的。正如一個聖人不幸而生活於一羣蠻不講理的强盜之中，他既不能掉三寸不爛之舌去說服他們，只好學會了

他們的武藝來保持自己的生命。等到打得他們過之後，再拿出他自己的一套大道理來向他們賣弄宣傳，也未爲晚呀。』

我們的智識階級終不能逃出。從我們的遠祖傳下來的遺傳性的影響，對於如此明顯的事實還在今日一文，明日一論的辯論下去，正是我上面所說的不會動脚先愁前路是死胡同的現象。照我的淺見，我們如今只有先集中精力於建設方法之現代化，不管甚麼制度文物，只要是力量做得到的，便應當毫無顧忌地勇往直前去學人家。經過現代化之後，原有的種種特質可以與新的並行不悖的，讓它去並行，與新的相衝突的，便以新的代舊的。舊的文化之保存正不必我們去煩心，只要是好的，要扔也扔不了；而且中國還怕缺少抱殘守闕的人嗎？『總答覆』裏所說的『努力踏上日新又日新的前程』，應該就是這條路，我眞不解他們何以又要說『直是自甘滅亡』。如果有些先生們眞個擔心如此下去便眞會『反客爲主』，失去

了中華民族的特徵，則我可以對他說：『請您放心，就是如我所說的讓全個民族在一切方面勇往直前地幹下去，結果也只能希望得到百分之五十的成功，因爲民族的先天特質是變化不了的，而且民族的慣性非常大，在我中國尤其大得可驚；所以張之洞之『中體西用』說流行了幾十年，結果並沒有得到什麼『用，』而今日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諸位先生的『審愼選擇』說，結果恐怕也只能鼓勵北平市上的小報記者多駡兩聲崇拜科學的人爲咬西洋人的乾屎橛而已！

依據上面所論，我以爲今日唯一的表現中華民族的自信力的路徑祇有本孔子的『好學不倦』，孟子的『取人爲善』的精神去儘可能地學取在今世的一切强國中已著成效的東西——一切學問智識，文物制度，方法組織都包含在內。換言之，也就是所謂『全盤西化』。

（五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胡適

二十年前，美國『展望週報』(The Out Look)總編輯阿博特(Lyman Abbott)發表了一部自傳，其第一篇裏記他的父親的談話，說：『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十分之九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阿博特在這句話的後面加上一句評論，他說：『我父親的話是不錯的。但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他老人家的算術還有點小錯。其實剩下的那十分之一，也還只是名詞上的爭論。』

這幾個月裏，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我常常想起阿博特父子的議論。因此我又聯想到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的一點批評。那一年(一九二九)『中國基督教

年鑑』(Christian Yearbook)請我做一篇文字，我的題目是，『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過去，沒有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裏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那部年鑑出版後，潘光旦先生在『中國評論週報』裏寫了一篇英文書評，差不多全文是討論我那篇短文的。他指出我在那短文裏用了兩個意義不全同的字，一個是Wholesale westernization，可譯為『全盤西化』；一個是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可譯為『一心一意的現代化』，或『全力的現代化』，或『充分的現代化』。潘先生說，他可以完全贊成後面那個字，而不能接受前面那個字。這就是說，他可以贊成『全力現代化』，而不能贊成『全盤西化』。

陳序經吳景超諸位先生大概不會注意到我們在五六年前的英文討論。『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小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爲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爲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爲這個口號最近于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我一時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幾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會特別聲明『全盤』的意義不過是『充分』而已，不應該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數量的解釋。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爲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的提議的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例如我此刻穿着長袍，踏着中國緞鞋子，用的是鋼筆，寫的是中國字，談的是『西化』，究竟我有『全盤西化』的百分之幾，本來可以不生問題。這裏面本來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我自信我的長袍和緞鞋和中國字，並沒有違反我主張『充分世界化』的原則。我看了近日各位朋友的討論，頗有太瑣碎的爭論，如『見女人脫帽子』，是否『見男人也應該脫帽子』；如我們『能吃番菜』，是不是我們的飲食也應全盤西化；這些事我看都不應該成問題。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這就夠了。

第二，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例如陳序經先生說：

吳景超先生既能承認了西方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釐毫之間罷。

我却以爲，與其希望別人犧牲那『毫釐之間』來遷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依我看來，在『充分世界化』的原則之下，吳景超，潘光旦，張佛泉，梁實秋，沈昌曄……諸先生當然都是我們的同志，而不是論敵了。就是那發表『總答覆』的十教授，他們既然提出了『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的三個標準，而這三件事又恰恰都是必須充分採用世界文化的最新工具和方法的，那麼，我們在這三點上邊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了。

第三，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

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你儘管相信『西菜較合衛生』，但事實上決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是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這些問題，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鄙見如此，不知各位文化討論者以爲何如？

（六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三個月前，我曾說過，胡適之先生「整個」思想不能列爲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胡適之先生當時以爲我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同時他且聲明道：「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最近胡適之先生發表一篇「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六月廿三日星期論文）裏面雖然還說他「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但是因爲他感覺到「全盤西化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因而提議以「充分世界化」這個名詞，來代替「全盤西化」這個名詞。胡先生說：

充分在數量上卽是儘量的意想，在精神上卽是用全力的意想。

我以爲在精神上，我們若用「全力」去西化，結果是在消極方面，必至否認中國固有的文化；在積極方面，還是趨於全盤西化。但是所謂「充分」或「儘量」這些名詞，不但很爲含混，而且很容易被了一般主張折衷，或趨於復古者，當作他們的護身符。

原來「充分」或「儘量」這些名詞，是可伸可縮的，可多可少的。比方，一個朋友託我辦一件事，我說，我當儘量去做；我對於這件事做得十分妥當，固然可以說是「儘量」，但是假使我只做了一點，也可以說是「儘量」。我記得嚴既澄先生曾在五月廿二日的大公報發表一篇「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贊成全盤西化，但同時他以爲「全盤」兩字，容易起人誤會，最好改爲「儘量」兩字。我又聯思到從前曾經力主西化的張東蓀先生，近來忽然徘徊於復古折衷之間，不但極力反對全盤西化，而且在正風半月刊一卷二期發表一篇「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提出孔子之道

，而近於辜鴻銘梁漱溟諸先生的主張；但他在這篇文裏也相信，我們「依然須盡量採納西方文化」。我們從此可以明白，贊成或趨於全盤西化的人，固可以主張「儘量」西化，喜談折衷或趨於復古的人，也可以主張「儘量」西化。同樣，假使百分之九十九的西化，能謂爲儘量西化或充分西化，那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也可以說是儘量西化或充分西化了。

此外，嚴既澄先生又以爲「西化」這個名詞頗不適當，最好改爲「現代化」。胡適之先生在其近作裏，也用「世界化」三字。我個人在以往的著作裏，也用過這兩個名詞，但我以爲，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爲世界化的文化，與所謂代表現代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這個名詞，不但包括了前兩者，而且較爲具體，較易理解。又胡先生雖用了「世界化」的字樣；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詞句。至於嚴先生雖覺得「西化」兩字頗不適當，但他也依然採用「全盤西

化」的名詞。所以我相信「西化」這個名詞的採用，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我已解釋「充分」或「儘量」「世界化」或「現代化」的口號的缺點，我現在且來談談胡適之先生提議避免全盤兩字的幾個理由。

胡先生的第一個理由是，「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照我的愚見看起來，什麼是瑣碎西化，什麼是根本西化，往往也成問題。例如，張佛泉先生好像以為共和國的頭腦是根本西化，劉湛恩先生好像以為基督教的精神是根本西化，吳景超先生又却好像以為這兩者都是瑣碎的西化，而以科學為根本西化。我以為在事實上，在趨勢上，我們既已有或不能不有這種頭腦，這種宗教與這種科學，那麼最好與唯一的辦法，還是全盤西化。而且在全盤西化的原則之下，張佛泉先生既可以專心提倡共和國的頭腦，劉湛恩先生也可以努力宣揚基督教的精神，吳景超先生也可以致志鼓吹科學。

又如禮貌或飲食是不是文化的瑣碎方面，也未嘗沒有問題的。要是人們相信國以禮爲維，民以食爲天或 mannist was er isst 的信條，那麼禮貌與飲食，就不能謂爲瑣碎的問題了。卽算我們相信這是瑣碎的問題，但是假使我們承認「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衞生與滋養」，那麼禮貌與飲食的全盤西化又有什麼理由而要極力反對呢？若說這「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那麼「坐了汽車，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恐怕也「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

四十年前，郭嵩燾曾很感慨的說：「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四十年來，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的教訓，不少的侮辱，然而「中國之人心」，至今還「有萬不可解者」。例如，有好多人力說中服較便利，爲國粹；然而若有了機會去西洋留學，或到外國遊歷，他們立刻忘記這種便利，不願宣揚國粹，而大穿其西服了！

又如我們的好多軍事長官，令士兵時着西化軍裝，我們的好多學校當局，要學生常穿西化制服，以爲若非如此，不足以壯觀瞻而振精神、然而他們自己却往往穿起長衫，提倡中服，以爲這是便利，而忘記了壯觀瞻而振精神了！

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一四二號「編輯後記」，曾很肯定的指出折衷是不能，是空談，只有全盤西化一條路。現在既依然「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那麼胡先生大概還能相信，我們除了全盤西化外，「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

胡先生的第二個理由是：「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所以胡先生說：

與其希望別人犧牲毫釐之間來遷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

我對於胡先生這種退讓的態度，是不敢表以同情的。原因是：一來，我們相信無論在需要上，在趨勢上，在事實上，在理論上，全盤西化都有可能性的；所以我們纔主張全盤西化。換句話來說，全盤西化論既非憑空造出來，全盤西化論也决不能爲欲博了幾個人的同情，而就要拋棄或避免。至於在政策上，我們應該主張全盤西化，胡先生已經說過，無須我來贅述。二來，所謂「容易得着同情贊助」的意義，大概不外就是表示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少過主張根本西化的人，所以少數的全盤西化論者，應該退讓一步，以博取較多的根本西化論者的同情。我以爲我們不要忘記，今日能主張根本西化者，還是寥寥無幾。大多數的人，還是醉夢於中西各半的折衷論調，或是趨於復古的變相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論調。假使全盤西化論者，因爲要想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而放棄這種主張，以遷就根本西化論，那麼根本西化論者，也恐怕要因爲這個原故，而放棄其主張，以遷就那

般主張折衷或趨於復古的論調了。

近來還有些人，以爲全盤西化論，最易引起守舊者的反響。他們以爲苟能避免「全盤」兩字，則守舊者必無所藉口。我的回答，是除了我們完全贊成復古或守舊外，恐怕我們沒有別的方法滿足他們。郭嵩燾的機器西化，固爲當時的士大夫所反對，張之洞的西學爲用，也爲學貫中西的辜鴻銘所不取。連了最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據我所知的，也有不少的出版物，指摘其爲太過西化！在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的環境之下，全盤西化論固不「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難道根本西化論，就能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嗎？其實若在「沒開誠接受」全盤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人們批評或反對，而至要退讓以博其同情，恐怕「那便仍是一種變象」的折衷調和論調。

而況能夠主張根本西化，或胡先生所說的「充分西化」，大概總能表同情於全

盤西化論。張佛泉先生與嚴既澄先生，固無待說，即胡先生自己，也說，「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爲這個口號，最近於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所以能夠承認西洋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可以全盤承認。至少大體上總可以表同情於全盤西化。若說這些所謂瑣碎的一點，都不願承認，那豈不是太過固執嗎？若說這些所謂瑣碎的一點，決不能西化，那怎能又可以充分西化呢？

假使我的觀察，大致不錯，我還可以說，數月以來的全盤西化的言論，好像也能引起不少的人們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認識，進一步的承認。即如張佛泉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所發表「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一文裏，以爲「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嚴峻的攻擊」，可是後來他自己却不顧到這種「嚴峻的攻擊」，而「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又如嚴既澄先生，十餘年前，在民鐸雜

誌三卷三期發表一篇「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爲「東西文化，不但有調和的可能，並且是非調和不可」，現在他却極力主張全盤西化。

總之七十年來，我們對於西洋文化的承認，是逐漸增加的。我們旣尙且可以從極端的排斥西洋文化而承認其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從十二分之十以上而至於全盤西化，還有什麼問題呢？至少我們旣已承認西洋文化爲較優勝，較適宜的文化，我們就不應該反對全盤西化，而免「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危險呵。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胡先生提議避免全盤的字樣的第三個理由。胡先生說：

> 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

我在獨立評論一四七號所發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裏，曾對於胡先生所提出

的文化惰性，有所解釋。我且說，「正是因爲這種惰性成爲西化的窒碍物，所以主張全盤西化」。胡先生對於這一點，也並不否認。所以他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也說「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想胡先生當時之所以極力贊成全盤西化，大概無非爲着這個原故。未知胡先生現在又爲着什麽原故，而好像投降於中國文化的惰性。假使全盤西化，是「處處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難道「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以至二分之一的西化，就不會「處處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嗎？反過來說，假使充分西化根本西化以至二分之一的西化可以不受這種限制，全盤西化也可以不受這種限制。

胡先生又說：

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

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

我以為「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理智往往也是「無所施其技」的。我們三百餘年來的理智，豈不是告訴我們不要基督教嗎？然而，結果究竟如何？而況，我們今日的理智却使我們承認，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至於事實上，中國的基督教在目下也不只是一派的。天主教及其很多的派別，固已輸入；新教及其好多派別，也已進來。說到將來，我們既不能說也許有的尚未東來的派別，或「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不會不被淘汰或現代化，我們也不能說這些派別或成分永遠不會傳播到中國。

又胡先生好像以為基督教的派別太多而至「互相詆毀」，是一件不當效法的事

。我却以爲所謂「詆毀」大槪恐怕就是爭競。至少含有爭競的意義，西洋文化，不但宗教方面是如此，就是別的方面也都如此。又况派別繁多，「互相詆毀」或爭競，不但往往能使人們可以自由信仰，而且能使人們可以反省更新。能有自由信仰，個性乃可發展，能有反省更新，文化始可進步。例如，中國的思想的派別之多，莫若春秋戰國，然所謂思想的黃金時代的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也豈不是自己「互相詆毀」嗎？我想二千年來——特別是五百年來的中國文化之所以遠比不上西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未嘗不就在這裏。這是研究中西文化發展史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最後，我同情於胡先生所謂「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然而同時我們似也不能否認，除了這種「嚴格」的說法以外，有了一種普通的說法。例如，我和好幾位同事，有好多次因事未能參加

我們的學校的教職員「全體」拍照，然而掛在壁上的照像，依然寫着「本校教職員「全體」攝影」，這個「全體」豈不就是「全盤」嗎？自然的，我在這裏只想指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至於我個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爲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的出路。

（獨立評論一六〇號）

答陳序經先生

胡適

陳序經先生這篇文字是前天收到的。那天晚上我就見着他，——我們通信多年，這囘還是第一次見面。我們暢談這個問題，似乎意見不很相遠。我當日提議用「充分世界化」來替代「全盤西化」，正是因爲「充分」「儘量」等字稍有伸縮力，而「全盤」一字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無謂的紛爭。如今陳序經先生說：「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那就是他也承認「全盤」一字可作活用，也可以稍有伸縮餘地了。但我的愚見以爲「全盤」是個硬性字，還是讓它保存本來的硬性爲妙；如要把它彈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至於有人濫用「充分」「儘量」等字，來遮蓋他們的復古傾向，那是不可避免的，我們

儘可以不必介意。

其次，我不信「理智」的作用是像陳序經先生說的那麼眇小的。在各種文化接觸的時期，有許多部分的抗拒與接受確然是不合理性的。最明顯的例子是今日的新式結婚儀節中的許多盲目的模仿，如新婦披面紗，如新郎穿大禮服；如來賓在行禮之前用色紙片，色紙條，碎米，等等擲擊新郎新婦，把他們的盛裝都毀壞了；有時候，我看見新郎進門手拿一個銅盤遮住面部，以防粹米細砂拋入眼睛裏去！在這些方面，理智的作用似乎很少。正如女人剪髮和熨髮的形式，女人袖子的長短，嘴唇上胭脂的深淺，這都不是理智所能爲力的。

但文化上的大趨勢，大運動，都是理智倡導的結果，這是毫無可疑的。如文學革命的運動，如女子解放的運動，都是理智倡導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然後引起熱烈的情感，然後大成功的。最明白的例子是蘇俄這十七年的大試驗，無論在

經濟方面，思想方面，宗教方面，政治方面，教育方面，都是由「理智」來計畫倡導，嚴格的用理智來制伏一切迷戀殘骸的情感，嚴格的用理智來制伏一切躲嬾畏難苟且的習慣。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在文化改革的大事業上，理智是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要的動力。

我們不可濫用理智來規定女人袖子的長短或鞋底的高低，但我們必須充分用理智來倡導那幾個根本大方向，大趨勢，大原則。凡文化上的惰性都是情感的成分居絕大部分，其中很少理智的分析與了解。今日倡導復古的人們都是不能充分運用理智來征服他們自誇或苟安的情感。

我們理想中的「充分世界化」，是用理智來認清我們的大方向，用理智來教人信仰我們認淸的大方向，用全力來戰勝一切守舊戀古的情感，用全力來領導全國朝着那幾個大方向走，——如此而已。至於一兩個私人在他們的私生活上愛讀仁

在堂的八股文，故愛做李義山的無題詩，或愛吃蛇肉，或愛聽二進宮，那才是我們的理智「無所施其技」的。

廿四，七，九。

（獨立評論一六〇號）

西化問題的尾聲

張佛泉

關于怎樣接受西洋文化的問題，幾月來全國報紙雜誌沒有不參加討論的。結果，我們可以說，是中國文化本位說受了很大的創傷，而同情澈底西化的佔了優勢。死老虎是用不着再打了。我們現在祇對全盤西化問題的含混意念，再稍加分析，藉以對我所主張的從根本處西化的觀點更做一番說明。所以這便算討論西化問題的尾聲了。

本來『全盤』兩字也不是沒有人偶然用過。不過堅持這兩個字，而給這兩字以確定的意義的，自然要歸功於陳序經敎授。我對陳先生的觀點在大體上是很同情的。不過我的主張與陳先生的微有區別。這我在拙著「西化問題之批判」（載國聞

週報十二卷十二期）一文內已有解說。我是主張從根本處西化的。我以爲西洋文化背後有一種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做泉源，於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明的表象才發長出來，才放射出來。牠這種精神，吾無確當名詞以名之，姑名之爲希臘的精神，或統稱之爲西方的頭腦。我以爲我們學西洋人，應當向這一方面着眼，應當努力達到這一點。另外有許多人主張「澈底」西化，或「儘量」西化。還有人主張西化不如稱爲「世界化」，或「現代化」。

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先生却是非常之認眞。凡他認爲稍與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馬馬虎虎收爲同志。胡適之先生和我都明白表示非常贊助他的主張，但他總以爲我們還不夠澈底。陳先生的這種實事求是，不肯調和的態度，本是人人應該有的。不過我以爲這要看所討論的對象是甚麼。所討論的對象有的容我們取確鑿的態度，有的非要我們取確鑿的態度不可，但也有的不容我們過于認眞，必欲

認眞，反有流弊可生。我想凡屬於各種社會科學，或人稱爲假科學的（Pseudo-sciences），大概都不能完全藉着確鑿的數學語言來解釋。卽自然科學的本範圍內，有的如動物學，植物學，醫學，或心理學等科目，也求不到最高度的確鑿。這是因爲有許多的題材，愈想向牠求確鑿，反得不到確鑿，如必欲表以確鑿的名詞，反易因之曲解了不確鑿的事實。所以在這時所應取的確鑿態度是：不能求確鑿的便老實不冒充確鑿。比如舊的物理學因爲信機械論過甚，所以對測量的確鑿向不發生問題。晚近因爲測算的方法進步，知道欲對某一些事理求絕對確鑿爲不可能，於是才用概然律（Law of Probability）來代替。這在物理學上是很大的一種進步。關於許多人事問題，老實說，是不能勉强求高度確鑿性的。晚近社會科學常利用統計。用數學計算時，固須從定法；得到的結數，也是確定不爽。不過我們不能因之忘記最初供爲計算的原料却並不確鑿。往往有人過信這種由不確定的

原料中得到的確定數目。這也是一種病症。

譬如關於文化問題，我想大概就不是用數學語言可以表示的。何謂文化？牠的定義恐不容易下。何謂西洋文化？定義恐更難捉摸。若祇抽象地解釋這個名詞，則必與不解釋相差無幾。如縷述內包的細目，則我們可以見到這些細目不但是複雜交織的，並且是變化倏忽的。你手到處，牠已經改了頭面。牠永是從你這裏逃開的。胡適之先生前曾指出中國思想界的通病在濫用空洞的名詞。他的話非常之確當。有許多名詞空大得幾乎不再有任何意義。如仁，義，忠，恕，一類的名詞，含義究如何，便不易回答。但是人類的思想是離不開這一類的名詞的。語言文字也是全仗着這種名詞。譬如我們用一個「筆」字，這「筆」字就是類名。祇有你指定我手裏所持的「筆」，那才是指到一件比較特殊的什物。但是如果你起始去描寫牠，你用任何字，任何字便都是有共性的，「這」，「紅」，「硬」等字都是如此。

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爲我們如曉得這一點，便可以避免胡適之先生所指出的思想上的通病。抽象的名詞是總要用的，但不能將抽象的名詞當做具體的事物。陳序經教授談西化問題，因爲他太想求確鑿，似乎就犯了以名詞來代替實物的毛病。他似乎將文化看成了石頭，說道，我們非由這塊赭的石頭，搖身一變成爲那塊堅而白的石頭不可。忘記了文化一名詞不是這樣具體的。如兄弟常用西方頭腦，和東方頭腦等名詞，便不敢將牠看成兩個有鼻有眼的活怪物。我不是說這樣的名詞是無物可代表，但牠到底代表甚麼，我却不能用手一一指出來。因爲這類的名詞總是抽象的。我祇能說我們欲想適應西化，就大體上講，應該向那一方面努力。因爲關于文化的這一類名詞，如愈將牠看得具體，外表似乎愈確鑿，但實際上却愈是曲解了不能確鑿的對象。

我們抛開「文化」，再論「全盤」。

論到「全盤」，我們可以見到上面所提出的困難更多。第一我們先要問「全盤」西化可以當做目的嗎？試問達到怎樣程度才算「全盤」？胡適之先生說：「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陳序經先生雖一面『只想指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但至終他『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爲完善較少危險文化的出路。』（見他的「全盤西化的辯護」，載獨立評論第一六〇號）胡先生是來反問，陳先生却拿百分數問題眞當煞有介事。我以爲陳先生用這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九十五的譬喻，應該好好先鄭重聲明那是個「譬喻」，並祇是個「譬喻」而已。嚴格說來，我不知道，西化的程度問題，怎樣能用數目字來表示。怎樣能像讀寒暑表似地決定西化程度已到百分之百，或已到百分之九十五？請問確鑿的客觀標準在那裏？所以如用「全盤」兩字，非要注重牠的數學的確鑿性不可時，那便也

祇變成了一種比喻。若所用的是譬喻，而竟忘其爲譬喻，則不啻指海市蜃樓爲實現矣。但「全盤」如不含有百分之百的數學意義，則依陳先生的觀點看來，便不如不用這兩字爲是。此外我們再用不着提出文化惰性，自然折衷等問題來，如提出這些問題則更將使「全盤」論遇到窒碍。總之，若以爲一個文化吸收另一文化，到後來可以變得如同兩塊方石一樣，除了空間不同外，處處都相似，恐是不可能的。

其次，我們要問「全盤」能否當做接受西洋文化的出發點。我想在這裏如果堅持「全盤」兩字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個社會起始接受另一文化的時候，總是一樣一樣，或幾樣幾樣地接收，而决不會 spontaneously 與 simultaneously 整個都機械地接收過來。這祇有藉着奇蹟方能達到。這個問題與文化是整個的還是可分的問題是有聯帶關係的。主張全盤西化的，當然同時主張文化不可割離。文化在許多

方面有有機性，這沒有問題。比如穿和服駕飛機，我想總不大方便。再如組織現代有效率的公司，而同時相信我們老牌的『有飯大家吃』主義，我想這買賣也定做不長。不過若把這有機性看得太機械化的時候，或竟將牠看成一個活的有機體（由 organic 的變而爲 organismic 的）時，那麼流弊就要來了。陳先生主張「全盤」西化，當然要反對調和，還要反對選擇；不但如此，甚至要反對實際的，已有的，正在進行中的調和與選擇。我所以說他的態度太過，就是因爲他否認事實。我所以說「全盤」不能當做出發點，就是因爲「全盤」沒有實際被人採用爲西化的方法的可能。

然則「全盤」西化既不足以當做出發點，又是不能完全達到的目標，君何以很同情這種主張呢？對於這個問題，我祇能這樣答：「全盤」的主張，代表一種態度，一種要求，一種情調。這種理論是對調和中西論的有力反應，所以在大體上，

是值得人同情的。若主張這種論調的，必欲對這種不容十分確鑿的文化問題求確鑿，必欲對不容數學語言來解釋的對象做這種解釋，那我祇有提醒他所用的方法，是不能用在這裏的！我不是要人馬虎，但我要人認清自己所討論的對象是怎樣的。假充確鑿，强求確鑿，正是不確鑿，正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所極應避免的。

我所主張的從根本處西化便沒有上述的缺欠。我在這裏祇指明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我以爲學得希臘的精神比學西人任何技藝部重要。在這一方面，我以爲應儘力學得像西人。在這一單位上，我們不能先求妥協，我們應徹底西化。在這種基本問題之外，有許多皮相問題，我們便可以不再管牠。

我這樣主張對接受西洋文化時應選到入手的基本要點，是因爲我見到在既往西化過程中，本也有選擇的。不過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是未經過研究，未經過批判的。我們今後應避免這種無目的的西化，而要設法找到一條可以貫通的康莊

大道。陳序經先生不主張選擇，則他祇有兩種對策，一是要樣樣，人人，處處，都整個一齊西化起來——這已如上面所指出爲不可能的路；一是祇有聽現在盲目的西化程序向前自然演進，如故意推動某一項，或阻止某一項，便亦等于有了選擇——容現狀自然演進，我想也不該是陳先生所喜歡的。陳先生所以屢次反對我們主張在接受西洋文化時有所取捨，便因爲取捨不是一件容易事，長短有時不易判斷，且各人有各的標準，難求到客觀的同意。不過陳先生也未免太看輕了理智的研究與分析，太看輕了社會科學有發現前因後果的可能。幷且我這樣主張根本處入手，雖然是一種抉別，但與旁人主張取長補短的調和論也正未可同日語。第一，我承認在主要的文化單位上，我們沒有什麼長處可以補西洋的短處；我們的短處也許一時不易爲人家的長處戰勝，這是因爲避不開的惰性，這有時是無可奈何的，而非我們故意希望牠們這樣調和，或進而希望甚麼新的創造，凌駕乎西

人之上。第二，我這種選擇論，是指明了一條西化的途徑，指淸應從那裏入手，解決的是西化過程中時間上先後的問題，這與調和中西長短說也是不相干的。第三，我所主張的，已如我前文所詳述，是橫的並存論，而不是各單位的縱的妥協論；譬如就思索方法單位來講，我們學了西人的縝密的邏輯，却在裝束單位方面，仍然可以不剪頭髮；這種說法也與體用的調和論或創造論有區別的。

至於關於我的從根本處西化的主張的詳細論證，則祇有在我三四年來論文化和論教育的論文中去找。這裏不許我重複過多。

我們這樣批評陳序經教授的全盤西化論，却不要不了他這次堅決主張全盤西化的功績。若不是他取這樣極端的態度，在廣州在北方都不會引起這樣熱鬧的爭論；也不會把由讀經出發，而文化統制，而文化建設的運動，被大家一盆凉水潑上去：澆得再也抬不起頭來；也不會這樣確定了我們澈底西化，永不再猶豫的態度！矯枉往往過正，但牠的影響不能抹煞。（七月卅一日）（國聞週報十二卷卅期）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

區少幹

十教授對於他們提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曾很鄭重地一再聲明：「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是不是要全盤西化」？他們的答覆當然不是：「而是對於固有文化則存其所當存；對於西洋文化則取其所當取」。那麼，這個所謂「本位」的構成，自然一半是固有文化，一半是西洋文化了。所以任憑十教授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來否認本位文化不是固有文化，也只能否認一半，其他一半歸根還是固有文化。於是也就跳不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嫌疑了。

這是照他們的解釋推論，如果我們再推進一步，簡直可以說，全盤西化也就

是中國本位文化。怎麼說呢？既然本位的解釋，是此時此地的需要，那麼這個「本位」的確立，全要看評價人估出此時此地的需要是什麼而定。如果有人指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要印度化，那麼印度化便是中國的本位文化。如果有人指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要全盤西化，那麼全盤西化，也就是中國本位文化了。「本位文化」，「全盤西化」，根本就不能成立兩個對立的名詞。但這種名詞，最能夠挑撥起一大堆感情的說話，感情的說話最足以障礙一切眞理的發現。因爲在民族的情感上，這兩個名詞顯然含有「敵」「我」的意義。如果我們不要這種挑撥感情的題目，而代以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或許我們會得到比較具體而有意義的結論。守舊的態度就不容易滲進去。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不妨拿十教授的話來看：

「總括起來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1）充實人民的生活。（2）發展國民

的生計。(3)爭取民族的生存。」

要完成這三項大計，如果我們仔細計算規劃起來，恐怕不容我們爭論，事實上便是全盤西化。

我們要完成這三項大計，所需要的是不是要行政効率的增加？交通網的完成？礦產水利的興發？科學的工業化，醫藥和公共衞生的改進？教育的普及？外交與國防的充實？……這些這些，一切一切，可憐都不是我們固有文化所能爲力，所以「本位文化之建設」發爲空論則甚容易而且堂皇，具體指陳則很難甚或竟不可能了。

文化兩個字的涵義很廣，概括起來，「一國或一民族對于環境的總適應就是文化」。所謂環境是(一)自然界，(二)物，(三)人，無論甚麼文化都是適應這三種環境的產兒。所以各國各民族的文化都沒有質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異。如果

我們肯平心靜氣，將現在中國的文化，和現在的西洋文化仔細較量一下，自然發覺這個程度上的差異。既然落後，便須趕上，即使我們一定要創造，也得先行趕上。比如日本的紡織業，他本來是個新興的國家，但他們現在的機器和出品都比老牌的英國還要好。只因他曾出過努力趕上的工作，才能夠有今日出頭的地步。凡是接受一種文化，很自然的是先接受現成而較好的，斷沒有放着現成而較好的不要，而指定在某一個抽像的範圍內，發明創造一種文化出來，這於事理是不合的。其結果只能發明某種飛雷，某種汽車之類，和那些披粉紅色頭紗的新娘，戴白帽頂套黑袖紗的孝子而已。

文化既然沒有質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異，深信各國族間的文化，經過長期間的溝通之後，終久會趨到平等相同的。科學的工業，是二十世紀西洋文化的結晶，難道因為他不是我們固有的，便不要工業化嗎？但凡能為我們用的文化就是

我們的文化。何必要問他是東是西呢？例如曆數，當我們推行陽曆的時候，絕大多數人說：我們故有的陰曆怎樣好，怎樣精密，殊不知亦不問這也是由外國來的，可知被我們用了的東西，也就是我們的了。這其間絕無保留特徵的必要，也沒有榮辱的意念存乎其間。將來我們的子孫讀歷史，知道我們在閉關以前靠着二千餘年傳統的文化維持，海禁大開之後，便採納了西洋的文化，加入這個世界的大潮流。這只足以証明我們識時務，善適應而已，有何恥辱可言！至於說一民族不能保留他的固有文化，便會趨於滅亡。這眞是無稽之談，不值得識者一笑，此說已有許多人糾正，不用我多說了。

我們不妨再設個比喻，用工尺譜代表中國文化，五線譜代表西洋文化，自從五線譜跑了進來之後。因爲他自身太過科學化了，工尺譜經不起他的摧陷，完全暴露了他的弱點出來。例如我們的二簧，西皮，孟姜女，都可以用五線譜很精密

的寫出來，但他們極普通的進行曲，如果用工尺譜寫着，就表不出他的時間和音堦。我們既然賞識五線譜，但又捨不得工尺譜，徘徊于兩者之間，希望調和工尺譜和五線譜，創出一種特別譜來，可乎不可？其實五線譜正是世界的樂譜，不論菲律賓，檀香山，印度，菲洲，都用他寫音樂。我們正不妨採用這個現成的樂譜，何必繞一個大灣子，費時生事呢！

又如醫藥，數十年來排拒的最厲害要算這個東西了。但細看我國現時各都市裏，民間最普遍的產科，花柳科，齒科，我們的國醫到那裏去了？這裏有一個事實，是我們談文化的人，須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這數十年間對于西洋文化，無論持甚麼態度，提倡接受也可，主張折衷調和也可，主張閉關嚴拒也可，他總是像怒海裏的巨輪一樣，雖然逆風橫浪，他老是鼓輪前進！在排拒得最嚴害的時候，就像風浪最大的時候，只能使他進行得慢一點，依然阻不着他的前進。結果

是民族的浪費大一點，民族進步遲一點而已。

我們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以復古爲標準的，復古復了二千餘年了。破關以後，持折衷調和之論者，也有數十年了。還是尋不得出路。我們這時正不妨開明主張接納這個代表世界文化的西洋文化！只要國家不亡，固有文化是亡不了的。

廿四，六，十七。

（獨立評論一六二號）

開明運動與文化

鄭昕

開明決不是文化的敵人，像一班尊古的人所想像的。開明與文化的關係，像是弟兄的關係：開明是大哥，文化是小弟弟，大哥已經做了一些小小的事業，而小弟弟正在滋養發育，將來正有作爲。也許他們的關係，是父子的關係，沒有開明的老子，不會有文化的兒子。中國自胡適之陳仲甫先生們提倡開明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名字，似乎不大妥當，文化沒有『新』『舊』，只有眞假的區別——中國的思想，的確健全了許多。可惜提倡這個大運動的如蔡子民，錢玄同，周作人諸先生，究竟都還不離書生的面目，不忍捨棄和平的氣概。只有個吳稚暉先生，才明白的揭倡機械主義，物質文明。適之先生當日在科學與人生觀的長序

裏，極力讚佩吳先生的主張，將這位『壓陣老將』調作『急先鋒』。急先鋒現在忙黨務去了，只有適之先生單人獨馬的咒罵貧窮，貪污，倚賴，不遺餘力的頌揚汽車，洋樓，電燈，電話……的物質文明，提倡思想獨立，反對因襲。有眼觀察中國社會，體驗中國思想的人，應該只有稱頌適之先生的主張，還怕不力；因為，開明的工作愈加緊，愈澈底，則眞文化的基礎愈鞏固，到眞文化路上的荊棘，愈能掃除淨盡。受過開明洗禮的人，建立文化的力量也愈大，建立文化的意志也愈強。所以我們說，開明不但是文化的哥哥，而且是他的老子。

文化的解釋很多，我們姑且替它下個定義：文化是人類精神工作的總加；包含科學，道德，藝術，宗教的原則，的發展。有人將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對立，這是指它們方法的不同。其實自然科學的研究，的欣賞，與道德，藝術，宗教的研究，的欣賞，一樣在文化創製的圈子裏。

開明的意義，康德解說得最好：『開明是人類（自討的）不自立的解放。不自立：是離開了別人，使不會思想。這種不自立，是自討的，它的原因，不是因爲理智的不夠，而是因爲沒有自立的勇氣；要有勇氣（Sapere aude! Habe Mut）去運用你自己的頭腦，這是開明的口號。』（見『何謂開明』一文）康德是適之先生所不喜的，然我却相信康德這類的話，很合適之先生的口味。適之先生只要肯念他幾篇警策的文章——除這篇外，如『什麼叫作思維？』——便覺得康德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敵人。所以不同的，康德完成了開明，而又克服了開明，爲理性的體系，立了個不拔的基礎；而適之先生則始終不肯越開明範圍一步，也許因爲開明的基礎不穩固，不能在上面建立文化的緣故？前十年陳仲甫先生與適之先生都爲『科學與人生觀』做序文，仲甫先生希望適之先生經過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後，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意思是說，進步到唯物史觀；適之先生當日未能同意。

忽忽十年過去了，在十年狂潮怒放，『左右』『新舊』傾軋的局面裏，我們應該看出我們眞正缺乏之的是什麼，急待補救的是什麼。我們今日也希望適之先生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由熱烈的開明工作，再進到文化的路上來。

適之先生的開明運動，來源是西方。適之先生是服膺西學的人，我們希望他肯全般的領悟西方文化。也大膽的全般接受西方文化；不要只看重西洋文化的『用』而進一步把握西洋物質文明所自出的『體』——文化本身。譬如再生運動，是西方文化主潮的一大關鍵。再生運動，是重新發現被中古埋沒的自我與自然。我們試問：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工作，我們做過沒有？自然的研究，自然的欣賞，幾乎與我們無緣。推開這層不論，只就『人的發現』來說，我們的社會，除了一堆互相依賴的關係的人外，很難找出獨立的，自由的，自主的人。自主(autonomy)二字，說出多麼容易，而在實際上履行，多麼難能。眞正的自主的原則確立

了，通行了，則道德上，政治上，法律上一切的爭論，等於空話。一個完全自立的人，你將他擺進『新』社會也好，你將他擺進『舊』社會也好；你叫他在汎繫主義的德國意國也好，你叫他在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也好；你將他擺進君主立憲英國，日本，或民主政體的法國，美國都無不可，因爲他配做一個眞正的好公民，好黨員：因爲他根據自主，自由的原則，利他而不自利，至少是利他勝於自利。自由決不是放縱，決不是任意。自由的遵守法律，而不是任意的不守法律，自由的尊重人己的道德人格，而不是任意毀壞人己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平淡無奇的再生時期的『人的發現』的原則還不能履行，則一切的社會革命與文化事業都是空談。西洋的思想是一貫的，而其政體上的改變，只是外形。我們確確實實的相信，歐洲的國家，不管是什麼政體，都妨礙不了整個民族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進步。譬如德國不管是如現在歐戰的老元戎與登堡當國——這位可敬的戰士，死去已經一

年了——或是極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或是共產黨的泰爾曼上台，我們相信他們人民愛公樂羣的觀念，決不因之減輕。儘管是敵黨敵派，而能各站在大學門前的一旁，雍容的各散各的傳單，在同一個街道上，各講各的政策，住在同一個院子裏，而能各做各的工，各盡各的職，而決不夾雜私人的仇恨與忌妒，這種公私分開，和平禮讓的氣象，那是我們自稱禮義之邦的中國社會裏所可想像的？

適之先生主張約法，人權，民治。西洋的約法，人權，民治，是有宗教——基督教——給他們做底子。然而，適之先生是歷史家，將宗教看作『神權』；神權屬於某個世紀，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舊』了。適之先生顯然是唯物，唯用。唯物，唯用澈底的出路，只有唯物史觀，然而，適之先生又是個和平論者，只肯夾在愚昧與强梁陣裏提倡人權，約法，民治。適之先生嗟嘆大衆的貧窮，而却不肯叫經濟一尊；適之先生怪中國到今天還沒有一部讚揚資本主義，描寫工藝發揚

的小說，好像有了資本，有了物質，我們的社會便可不窮，我們的官吏便可不貪汚，我們的軍人便可不割據。適之先生讚揚物質，而不取澈底的唯物主義，提倡民治，而不要精神，（宗敎，文化），不肯承認懶惰倚賴，貪汚的原因，是精神的不自由，不自主。這是適之先生的兩難。我們一般民衆，過的是初民的生活，如果有厭惡物質文明，不提倡物質文明的人，是喪心病狂，放着事實不看，而一味空喊精神，文化，是痴人說夢。我們輾轉呻吟在貪汚，欺詐，憎惡，怯懦的社會裏，而反說提倡精神生活，人格獨立，宗敎，美術，文化等等是迂闊，復古，也一樣的偏執，不務根本。你們那裏見過西洋提倡文化，提倡精神生活的人，怪他們的社會事業過於發達，怪他們民衆思想過於獨立，過於不迷信？你們又那裏見西洋的唯物的，革命的，怪他們的同志過於忠實，思想，行爲過於理性？

上面所提到的許多弱點，都是我們所專有的，而被『左右』『新舊』兩方面的人

忽視，掩護，所以它們的惡勢力，有加無已。很少有人看出：物質與精神，開明與文化，不是違背，而是互助互長的，在一條道路，一個方向上的兩段行程。解放，開明，再多些解放，開明；——於是，理性，文化，再多些理性，文化！這點像哥侖布的雞蛋一樣平淡無奇的秘密，望思想界人們能明白的認識。我們的思相家似乎專歡喜發現事理的對立，有我便沒有你。譬如：美育可以代替宗教；哲學家的飯碗，可以被科學家搶去；看看別人家的博物館，化學工廠紅眼，自家的線裝書便得進廁所！開明運動，任何進步一點的國家，都得經過，並且非常有益，像我們的開明的口號喊出去，便不見下文，却很能害事。我們要知道，有許多爭端，並不是爭端。我們應該領會海拉克里(Heracleitus)相爭的和諧的道理。

一九三二，十一，四。

（獨立評論一六二號）

一年來國人對于西化態度的變化

陳序經

一

七十年來，國人對於西化這個問題，曾有過不少的討論。然而討論的興趣最爲濃厚，情形最爲熱烈，同時最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的，恐怕要算民國二十四年這一年了。

這一年來的文化討論的重心，是全盤西化的主張與本位文化的宣言。有些人說，前者是因爲反對後者而發生的。這是一種錯誤。十年前，盧觀偉陳受頤兩先生與我，已感覺到全盤西化的必要。民國十七年，盧陳兩先生與我同事嶺南大學

，對於這種主張，曾輪流作過十餘次演講。此後，嶺南的教授與學生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斷的加以討論。此外我又在廣州各校作過好幾次演講。民國十九年，我草了一篇「東西文化觀」，登在社會學刊第一卷第三期。過了一年，又寫一本「中國文化的出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均是說明全盤西化的主張的。民國二十二年，我應廣州協和大學及中山大學之請，對於這個問題，作長期演講。當時廣東當局，正實行祀孔而趨向於復古，中大社會學系主任胡體乾先生，因而發起中國文化問題演講會，要我十二月二十九日再作公開演講一次。我的演講稿發表於二十三年正月的民國日報。

因爲了我這次的演講，還引起一場很熱烈的文化論戰。在演講方面，除我外，還有許地山先生，及中山大學數位教授。在文字方面發表者，有謝扶雅，張磬，陳安仁，張君勱，盧觀偉，呂學海，馮恩榮諸先生及其他十數位。文章之發表

者，有好幾十篇，時間延長了一年之久。

大體上，這一次的討論結果，有了下面數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對於當時當地的復古趨向，不但沒有一位同情，而其實差不多沒有一位不表示反對。

第二，一般反對全盤西化論的折衷派，既非主張重中輕西而近於復古的折衷派，也非主張中西各半的眞正折衷派，而乃重西輕中而近於全盤西化的折衷派。例如：謝扶雅張君勱先生等，是最近於全盤西化論的。此外爲反對全盤西化而發表文章最多的陳安仁先生，也承認「現代西洋文化比我們中國文化高明得多」。又如譏罵我最利害的張磬先生，也非反對大部分的西化，而乃是「他所謂爲無條件的全盤接受」。

第三，贊成全盤西化者，逐漸增多；同時，全盤西化的理論，經過這一次的

討論之後，較爲顯明。

我把廣州去年一年中的文化論戰，略爲敘述，因爲，一來，我要指明全盤西化的主張，是遠在本位文化的宣言之前，與其說前者是因爲反對後者而發生，不如說後者是因爲反對前者而發生，較爲合理，這是讀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人，都能明白的，二來，我有時感覺到這一年來的文化討論，好像是廣東去年的文化討論的延長與放大。

二

全盤西化論，正在南方得到相當的注意與同情的時候，中央政府又跟着廣東當局而實行祀孔，復古的空氣，因而漫延全國，十教授是在這種的情形之下，而發表他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他們說：

徒然贊美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是無用的，徒然詛咒古代的中國制度思想，也是一樣無用，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

又說：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

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然而骨子裏，却是趨於復古的途徑。有些人且說：十教授是受了當時趨於復古的當局的暗示而發表宣言，我們對於這一點，不願參加意見，但是十教授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既是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徵，那麼他們不能否認有了復古的趨向與嫌疑。何況所謂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正像：

日本畫家常常說：西洋人雖嫌日本畫的色彩，過於强烈，但若日本畫沒有那

種刺目的强烈色彩，那裏還成爲日本書。

我在「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後」(大公報五月二十日)文裏，曾說：若照這種邏輯推衍起來，結果是比方中國女子之所以爲中國女子，就是因爲她們有小脚，奉「三從四德」。中國男人之所以爲中國男人　就是因爲他們嗜鴉片，能「左抱右擁」。中國船之所以爲中國船，就是因爲用帆駛。中國車之所以爲中國車，就是因爲用騾拖。這麼一來，凡是中國固有的文化都要保存而成爲復古了。

這種推論，並不只是我個人的獨見，而乃很普遍的看法。我現在且摘錄嚴既澄先生在五月二十日的大公報所發表『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所述一段話，以爲例子。

例如北平市各名流，舉行第一次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座談會於公園水榭之時，

便有某院長說到今日到會的人，大多數都穿着中國衣服，可見還是主張中國本位文化者爲較多的話。而且當時到會者所發言論，大都側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發揚。

嚴先生又指出「那天也參加座談會的宣言起草人之一陶希聖先生，却並未明白矯正各位發言人的誤解」。可見宣言起草的陶先生，承認本位的文化，是保存固有的文化了。

又如：北平晨報十二月十五日體育欄，載河南百泉鄉村師範學校所主辦的鄉民運動大會，提倡國術比賽，毽子比賽等運動，該報記者以爲這是「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同時加以按語道：「値此建設中國本位文化之聲浪，高唱入雲時代，確有大提倡而特提倡之意義也」。

在「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全盤西化言論續集）一文，我曾說道：

退一步來說，就使我們相信十教授的主張，是不守舊，不復古，十教授的「宣言」至多也跳不出三十五年前張之洞所畫的圈子，雖則十教授曾批評張氏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爲皮毛西化。——十教授所謂中國本位，豈不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爲體」嗎？十教授所謂「吸收歐美的文化，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豈不就是張之洞的西學爲用嗎？

胡適之先生和很多位，都有了同樣的見解，而潘光旦先生在華年周刊四卷三期所發表「談中國本位」一文，以爲：

本位二字，是不難了解的。物有本末，……本末也有主客的意思，所以本位就等於主體。也有輕重的意思，所以本位所在，就等於重心所寄。也有中心與邊緣的意思，所以以中國爲本位，就無異以中國爲中心。譯成英文，是Sino-certric。中國的稱號，原有這個意思，個同時也養成一種妄自跨大的心

理。

潘先生「對於這個宣言，大體上很贊同」，所以我特地的把這段話抄在這裏。我希望一般主張或辯護「本位文化」的人，不要以爲我們因爲反對「本位文化」而至曲解本位這兩個字罷。

盧觀偉先生在「趨於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全盤西化言論續集）一文裏說：大體上，西化程度不過一半，五對五的趨勢的二元論，才是眞正的折衷派，超過一半以上，則已入了西化本位。

張佛泉先生屢指出根本西化與全盤西化是很接近的，他所謂根本西化就是盧先生所謂西化本位。西化本位既是近於全盤西化，則中國本位的文化，不能否認其近於復古了。

三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以後，受了各方面——特別是全盤西化說——的批評，於是五月十日，十教授又發表一篇「我們的總答覆」。我覺得十教授在「總答覆」裏的態度，比起他們在「宣言」裏的態度，已經變化得很厲害；同時，在表面上，他們雖仍然懷疑全盤西化論，事實上却已趨在這條路上；因而草了一篇「讀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後」，登在五月二十日的大公報，解釋他們的態度的變化。我以爲：

十教授……在「總答覆」裏不但反對「任何復古」而且反對各種折衷。所謂「復古的企圖，不但是抱殘守缺，簡直是自覓死路」。是很顯明的指出現在所遺留的多少的固有殘闕，也要掃除。所謂「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是很肯定的排斥整個固有的文化。那麼十教授在這裏不但放棄了日本畫家的理論，而且放棄了「存其所當存」的態度。

這種見解，也不是我個人的見解，而是一般人的見解。連了一般同情於十教授的宣言的人，也有這種感想。例如徐彝尊先生在正論旬刊第二十八期裏所發表的「讀上海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覆」一文中說：

固有的好東西，如果現時還存在着，我們便應該去保存他，保存便是守舊。如果這些東西，現時不幸已經失掉，我們便應該去恢復他，恢復便是復古。守舊和復古，在相當條件下，並不一定便是壞事。……十教授在「宣言」中，到還說過些「必需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的話頭，誰知在「總答覆」中，却又直截痛快的說：「對於任何復古的企圖都採排斥的態度」了！我們雖不可以辭害意，批評十教授的主張，前後不能一貫，但總有些埋怨他們擇語的不愼。何況他們又明明的，在不守舊的前提下，滿裝了些「復活封建作爲」，「製造人工黑夜」，「延長進化過程」等一類話。大有守舊

云者，如此這般而已的意思，這豈不是他們對於守舊兩字的誤解曲解麼？

關於十敎授在「總答覆」反對各種折衷說，我曾說：

十敎授說：「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便有什麼體」。又說：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根本不能分離。這種理論，本是我們主張全盤西化人的理論，我很奇怪十教授現在也能承認。十敎授既不反對西化之用，則採納人家之用，不能不採用其體。十敎授既不反對物質西化，則採納人家的物質，不能不採納其精神。這樣看起來，試問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在「總答覆」裏，消極方面，他們既反對任何復古，與各種折衷，積極方面，他們又顯明的趨於全盤西化的路上，所以我又說：

十敎授在「總答覆」裏雖則仍像在「宣言」裏，以爲中國本位的文化，是要合此

時此地的需要，可是他們所謂此時此地的需要，現在却已變爲（一）充實人民的生活，（二）發展國民的生計，（三）爭取民族的生存。我以爲從文化的立場來看，這三種需要，在名詞上固是不同，在事實上幷沒有什麼差異。所以第二項以至第三項，都可以說是包括或依賴於第一項。至少二三兩項與第一項，是不能分離的。十教授在第一項裏，既顯明的說：「中國人民的生活，非常貧乏，物質方面，不消說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嘗豐富。」那麼十教授不但承認在文化的物質方面，我們要西化，而且承認在文化的精神方面，我們也要西化了，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要西化　豈不是成爲全盤西化嗎？

胡適之先生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六月二十一日大公報）一文裏，以爲「我們……可以歡迎總答覆以後的十教授做我們的同志」，大概就是因爲總答覆裏的態度，是近於全盤西化論的。嚴既澄先生在「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也說：

我把十位宣言起草者的這篇「總答覆」，仔細看過了兩遍之後，頗覺得他們的根本主張，其實是和所謂全盤西化說，大體相近的。祇可惜他們被了這套繞圈兒的文字遮蔽着了，只圖理論上說得通，(？)文字上說得痛快，就此模糊籠統地把自己的立脚點，說成了一個大零號而不自知。

四

全盤西化論不但只引起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的十教授，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認識，而且引起一般人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承認。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幾位代表人物，而分作幾方面來說明。

第一，最初對於「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有過相當或多少同情，而後來却變其態度者，例如吳景超先生。我上面已經說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在表面上，雖很像是「老生常談」的折衷論調，可是骨子裏却是趨於復古的途徑。吳先生所贊同的宣言，我們可以說，不是骨子裏的復古趨向，而乃表面上的折衷論調。他因爲贊同這種折衷的態度，所以他反對全盤西化論。因此他遂在獨立評論第一三九號發表一篇「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我讀了他這篇文後，乃寫一篇「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登在獨立評論第一四二號。此外我又發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後來吳先生又發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希望我們因討論這個西化問題，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我以爲吳先生在這一篇文裏的態度，比起「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裏的態度，已經變化得很厲害，因又草一篇「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登在獨立評論一四九號。我在這篇文裏，指出吳先生在「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一文裏的態度變更之利害，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結

論是：「若照吳先生所說的四種採納西洋文化的態度，而用張佛泉先生的算術方法加起來，則吳先生正像了張先生所說：已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四分之三以上，而竟與全盤西化論很接近了」。我因而又說：

吳先生既承認了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那麼吳先生之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釐之間罷。

我想，這個結論，大致上是不錯的。而且後來吳景超先生在大公報（七月七日）又發表一篇「自信心的根據」。裏面有一段話，足以證明我這個結論，我願意把牠抄在下面：

近來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裏，有幾篇具體的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胡適之先生說我們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可以在世界上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最簡易合理的文法，第二是平民化的社會構造，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梁實秋先

生也提出三點，第一是中國的菜比外國好吃，第二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舒適，第三是中國的宮室園林比外國的雅麗。張熙若先生在中國的文化中看中了兩點（按張先生也提出了第三點，這就是中國飯）便是宮殿式的建築，及寫意的山水畫。此外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還有，但我還沒有看到一篇文章，能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到十項以上，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拿中西的文化互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大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我們可以說，吳先生在這裏，是有意的，和積極的，近於全盤西化論了。其實胡適之，梁實秋，與張熙若三先生所各提出三種優點，還大有討論的必要。我們對於這點，這裏暫且不提。但是我們可以說：文化的各方面或成分是千緒萬端，把胡梁張三先生所揭出的各種優點合共起來，也不到十項以上，那麼一拿中西

的文化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無疑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此外又如張季同先生在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十期曾發表「關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贊成十教授的宣言，反對「全盤承受西洋文化的見解」，因而引起沈昌曄先生的「論文化的創造——致張季同先生」（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沈先生的長文是站在全盤西化論的立場而批評張先生的。後來張先生又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九二十期）發表一篇「西化與創造——答沈昌曄先生」然而在這篇文裏，張先生的態度，也變了多少。且看他說：

當然，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除地域的不同外，倘有時間上，階級上，的不同，中國文化是落後的，西洋文化實優於中國的，因而中國在文化中應保持而發展者少，西洋文化應介紹而吸收者多。

張先生又肯定的說，「西洋文化多量採納是必須的」。這樣看起來，張先生可

以說是從「中國本位」的文化，而變爲盧觀偉先生所謂爲「西化本位」了。

五

第二，原來主張或偏於折衷而後來却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者，例如嚴既澄先生。嚴先生十餘年前，在民鐸雜誌三卷三期發表了一篇『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的結論是：『東西文化不但有調和的可能，並且非調和不可。』這當然是折衷的論調。但是在他五月二十二日大公報所發表的『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裏，他却極力反對折衷，他很痛快的說：

天下事絕不能盡如人意。看準了目前必需去走的路子，便只有勇往直前，走到那裏，算那裏。就是明知這條路中途曾發生某種危險，也只好到那時，再想法子去挽救。這總比停留在岐口上去仔細揣摩那一條路纔是萬靈的路好得

多。調和折衷的精神，在中國整部歷史上所產生的結果，到如今總算起來，實在是壞的多，好的少。而到了今日，一切事變都以異常的速度，把我們向前推擠，再沒有從前那樣豐富的時光留給我們去遲疑回顧了。於是這種精神，便立刻產生出異常重大的壞影响來。

消極方面他反對折衷論調，反對『本位文化』。積極方面，他贊成全盤西化論。但這篇文章，是贊成全盤西化論的一篇很有力的文章。他贊成全盤西化論的理由很多，然而最能動人的，是下面一段話：

我有一回曾經對一位國粹主義者的朋友說：我現在就算完全承認你的話，凡是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好的，值得永久保存的，然而在目前的强盜世界裏，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的時候，我們總得把別人拿來欺負我們剝削我們的種種東西，先拿在手裏，然後能够和他們一同生存。就算人家各國的文

化，都是壞到要不得的，我們也只好去學，因爲非如此，不能自立。人家各國所同有的叫做通性，我們所獨有的叫做特性，我們如今當作的事，就是努力習得人家的通性，然後以此來保存我們的特性，——假定我們的特性都是值得保存的。正如一聖人，不幸而生活於一羣蠻野不講理的强盜之中，他既不能掉三寸不爛之舌，去說服他們，只好學會了他們的武藝，來保持自己的生命，等到打得他們過之後，再拿出他自己的一套大道理來向他們賣弄宣傳，也未爲晚呀！

嚴既澄先生這篇文裏所說的話，並非沒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可是大體上，是我所贊同的，而凡我覺得贊成全盤西化的一般言論之能有如嚴先生這樣急進，很不多見。

我在這裏可以順便提及文學社等十餘團體，及上海百餘位名流所發表的「對

於文化運動的意見」。我知道署名發表這篇意見的人，有了一部份，好像曾表同情過折衷論調，可是從這篇宣言來看，他們却有相當的同情於全盤西化論。他們發表意見，「希望國人注意」，可惜事實上，國人對於這篇宣言，沒有給過相當的注意。因此，我很願意摘錄這篇宣言裏幾段話，以供國人參考。

我們相信復古運動是不會有前途的。假如讀經可以救國，那麽「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全是多事了。假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義，可以救國，那麽李鴻章張之洞早已成了大功了。時勢已推演到這個地步，而突然有這種反動現象發生，我們雖然明白其原因，並不簡單，但不能不對這種庸的呼號，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促其反省。不錯，中國民族必須有自信心，信賴我們的自立能力。我們不願作帝國主義的奴隸，我們要從現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掙扎出來。我們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業。但這一切，並不是憧憬於

過去的光榮，就可以成功的。一個破落戶捧着廢址上的殘磚碎瓦，以爲這就可以重建樓台，誰都知道只是一個愚妄的夢想。

我們以爲民族的自救，除了向維新的路上走去，再沒有辦法了。一切建設事業，軍事設備，都需要最進步的物質文明的幫助，惟有文化工作，却故步自封，不願受外來的影响，這豈是可能之事。

凡偉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來的文化。羅馬帝國是全盤的承受了希臘文明的。中國的文化到底有幾分之幾是純粹的國粹，也大是疑問。國樂器的胡琴，便是「殭胡」一物。所謂長袍馬褂的禮服，也是「胡服」。最初的床，被稱爲「胡床」。民間最流行的燒餅，就是「胡餅」。如果除去外來的成分，樣樣都要國粹，就非恢復「席地」「鼎食」「車戰」「漢衣冠」不可。這是誰都知道不可能的。那麼爲什麼對於文化生活　却非要求讀經作古文不可呢？

這篇宣言好像是側重於攻擊讀經與存文的運動。然而上面數段話，是無疑的為着一般的復古趨向而發的。此外宣言裏也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文化」兩字有時用以包括物質精神二方面，有時又好像只指着精神生活方面。但是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態度是很顯明的。他們在消極方面，指出「過去的光榮」已成過去，而目下所遺留的「殘磚碎瓦」決不能「重建樓台」，這可以說是全盤否定中國的固有文化，他們在積極方面，指出凡偉大的民族，差不多都吸收外來的文化，而且以為「羅馬帝國是全盤的承受了希臘文明的」，這是明明白白的承認全盤西化的可能，而表同情於全盤西化的主張了。

六

第三，本來主張根本西化，而後來卻表同情於全盤西化論者，例如張佛泉先

生。關於張先生數年來的主張，盧觀偉先生在「趨於全盤西化的共同信仰」一文，（全盤西化言論續集）已經有了一段綜述。我在這裏所要指出的，是張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九期所發表「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一文裏，還以爲「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嚴峻的攻擊」。但是後來，他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二期所發表「西化問題之批評」一篇長文，他自己却不顧到這種「嚴峻的攻擊」而「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張先生大體上雖給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然也有多少分別懷疑之處。這一點我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獨立評論一四七號）已經解釋。後來張先生又發表一篇「西化問題的尾聲」，（國聞週報十二卷三十期）一方面，重申他對我「的觀點在大體上是很同情的」，一方面，說明他的主張與我的「微有區別」。我現在暫且放開我們微有區別的點，而摘錄關於張先生之所以表同情於全盤西化的主張的一段話。

然則……君何以很同情這種主張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只能這樣答：全盤的主張，代表一種態度，一種要求，一種情調。這種理論，是對調和中西論的有力反應，所以在大體上，是值得人同情的。

我們在這裏可以連帶的略談胡適之先生的態度。胡先生是主張西化很力的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據他說：一九二九年，他曾用英文為中國基督教年鑑寫了一篇「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裏面曾用過 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及 Wholehearted westernization 的字樣。可惜我到今還沒有看過這篇文章。但是照我個人的觀察，在胡先生未在獨立評論一四二號發表他的編輯後記以前，他的整個思想，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是在這篇編輯後記裏，胡先生始很顯明的同情於全盤西化論。他說：

現在的人說折衷，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

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只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眞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將來也許作專文發表。此時，我只借此聲明，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在我們「再談全盤西化」一文裏，雖然指出胡先生與我的意見，究有差別之處，可是胡先生這種同情，對於全盤西化論壯了不少聲勢。後來胡先生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一文，(大公報六月二十三日)要想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與得着一般人的同情的贊助，因而提議以「充分世界化」這個口號，來替代「全盤西化」這個名詞。我當時對於胡先生這種提議，表示反對，因作「全盤西化的辯

護」一文，登在獨立評論一六〇號。平情而論，胡先生現在雖退出全盤西化論的戰線，然他在西化問題的態度上，始終是很近於全盤西化論的。這一點他在「答陳序經先生」一文，（獨立評論一六零號）也未嘗否認。

七

上面所說的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大概上是注重於團體或個人的本身上的先後不同方面。其實這一年來，國人之同情或趨於全盤西化論者，除了上面所說諸位外，其較爲顯明者，尚有如沈昌曄，區少幹，鄭昕諸先生。

沈昌曄先生在國聞週報十二卷十四期所發表「論文化的創造」一文，不但極力贊同全盤西化，而且以爲全盤西化是「創造中國新文化的出路」。他說：

我以爲現在文化界的領袖們，應放大了胆來做採納整個西洋文化，以培養中

國的新精神的運動，不應怕全盤西化有成爲西洋文化的附庸的危險而不取，却應以大膽的魄力駕馭整個的西洋文化，使中國採納後的消化，有良好的經過，這是創造中國新的文化的出路。

區少幹先生在獨立評論一六三號發表「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一文，指出十教授所提出(一)充實人民的生活，(二)發展國民的生計，(三)爭取民族的生存這三種需要，若「要完成起來，恐怕不容我們爭論，事實上，便是全盤西化」。

鄭昕先生好像是見了胡適之先生提議以「充分世界化」這個口號，來替代「全盤西化」這個名詞，因而發表「開明運動與文化」。他說：

適之先生的開明運動，來源是西方。適之先生是服膺西學的人，我們希望他肯全般的領悟西方文化，也大胆的全盤接受西方文化，不要只看重西洋文化的「用」，而進一步把握西洋物質文明所自出的「體」——文化本身。

此外又如黃尊生先生在最近所出版的「中國問題之綜合的研究」一書裏的態度，也可以說是偏於全盤西化的。他以爲「中國此時，實在應該決定他的態度，對於世界文明，無條件的全盤接受」。

八

總而言之，西化這個問題，經過國人這一年來或這二年來的討論之後，大體上，我們可以說，一般趨向於復古論的人或主張老生常談的折衷論的人固已多能改變其態度，而逐漸近於全盤西化論，而一般相信根本西化說的人，也多能改變其態度，而同情或贊成全盤西化論。而且我們可以說：復古派已像「死老虎用不着再打了」，折衷派也「受了很大的創傷」，很少有人相信。結果是：近於或贊成全盤西化論者，不但「佔了優勢」，而且日趨日多。

二十四，十二，三十。（國聞週報十三卷二期）

關係論文目錄舉要（附錄一）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全盤西化的意義	馮恩榮	南風九期	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澈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	梁錫輝	南風九期	廿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寫了「澈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以後	梁錫輝	南大青年廿三卷五期	廿三年一月十二日
我對於研究「全盤或澈底接受西洋文化」問題的態度	何格恩	南大青年廿二卷五期	廿三年一月十二日
澈底西化釋義	呂學海	南大青年廿二卷五期	廿三年一月十二日
論基督教文化	馮恩榮	南大青年廿二卷五期	廿三年一月十二日
中國文化之出路	陳序經博士演講梁錫輝筆述	現代青年欄八二六至八二七期	廿三年一月十五，十六日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爲中國文化問題進一解	謝扶雅	現代青年八三一期	廿三年一月廿二日
中國文化之死路	張磬	現代青年八三四期	廿三年一月廿五日
爲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	張磬	現代青年八三六期	廿三年一月廿九日
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	陳序經	現代青年八三六期	廿三年一月卅日
評陳序經先生的「中國文化之出路」	王峯	現代青年八三七至八三八期	廿三年一月卅，卅一日
中國文化問題	祝伯英先生講 焯英筆記	現代青年八三二期	廿三年一月卅一日
評陳序經博士論中國文化之出路	林潮	現代青年八三八至八三九期	廿三年一月卅一日至二月一日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	張　磬	現代青年八四〇期	廿三年二月二日
對於一般懷疑「全盤和澈底的西化」的批評	馮恩榮	現代青年八四九期	廿三年二月十五日
廣州的文化之論戰	天　晛	華年週刊三卷十一期	廿三年三月廿四日
廣州文化論戰通訊	陳安仁	華年週刊三卷廿二期	廿三年六月九日
東西文化之分析	王孔衍	現代青年八四九至八五一期	廿三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
文化問題中國的幾個具體問題	何汝津	現代青年八五一期	廿三年二月十九日
中國文化的特質	穆　超	現代青年八五三期	廿三年二月廿一日

題目	作者	刊物	日期
西洋文化之本質	馮恩榮	現代青年八五三至八五四期	廿三年二月廿一至廿二日
中國文化「全盤西化」可以行得通嗎	穆超	民國日報副刊	廿三年五月廿四日
畧論陳序經博士研究中國文化出路之比較方法	家駒	同上五六期	廿三年六月一日
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	張君勱	同上六三至六九期	廿三年六月十六日至六月廿五日
關於全盤西化論的比較方法	馮恩榮	同上七三期	廿三年七月五日
再釋「全盤西化」	呂學海	同上七六期	廿三年七月五日
再論「全盤西化」	穆超	同上八十一期	廿三年七月十二日

篇名	作者	出處	日期
讀張君勱先生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後	呂學海	同上六三期	廿三年七月十九日
「全盤西化」乎！	吳良堯	同上八十七期	廿三年七月二十日
全盤西化和其他	非斯	同上八十七期	廿三年七月廿三日
西方化的討論	何永佶	同上二百八十期	廿三年十一月卅日
評「中國文化的出路」	余蘊仁	文化建設第一卷第二期	廿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國文化之出路	陳序經	文化第六期轉載全盤西化言論集	
評「中國文化的出路」	朱元懋	讀書顧問第三期	廿三年十月

附錄一

題目	作者	出處	日期
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	張東蓀	正風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廿四年一月十六日
建設問題與東方文化	吳景超	獨立評論一三九號	廿四年二月廿四日
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		獨立評論一四二號	廿四年一月十七日
西化問題之批判	張佛泉	國聞週報第十二期	廿四年四月一日

全盤西化言論集目錄（附錄二）

全盤西化言論續集目錄（附錄三）

學術叢書第三種

全盤西化言論三集

編者：麥發穎

出版者：嶺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研究股出版

印刷者：廣州培英印務局

民國卅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